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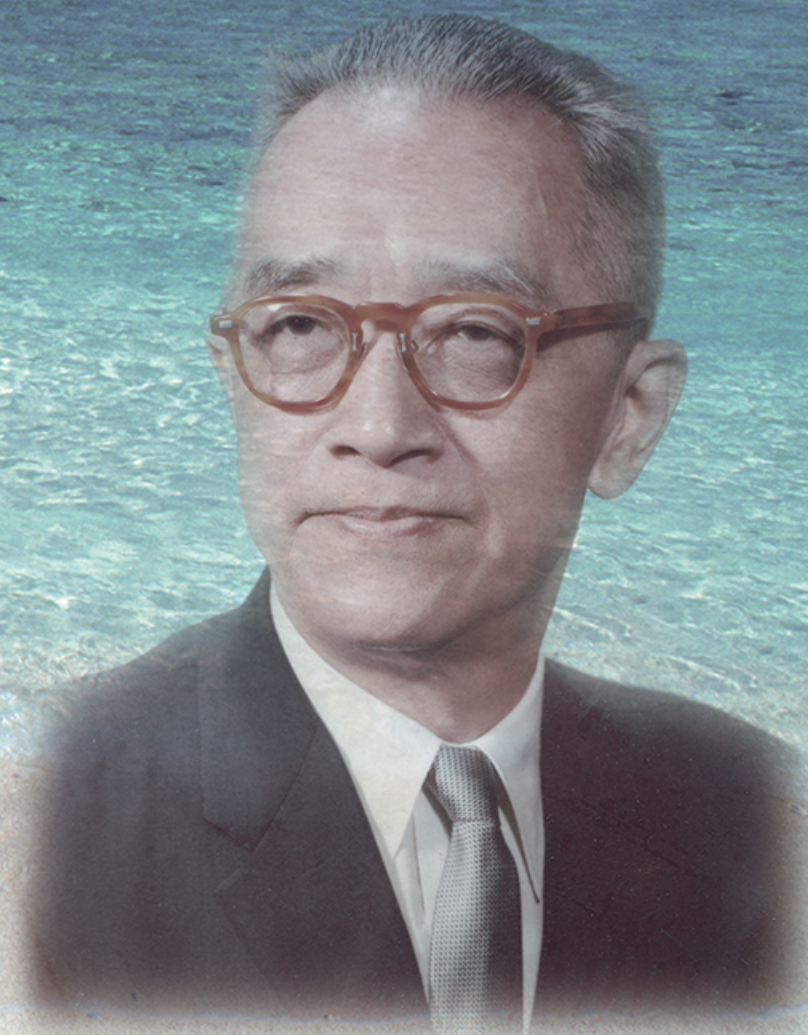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 胡适研究通讯

2018年第3期 (总第43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18年9月25日





# 目 录

雷案风波中的胡适与蒋介石 .....	耿云志 (1)
《胡適全集》序言 .....	潘光哲 (8)
胡适写给吴相湘的两封未刊书信 .....	邹新明 (9)
胡适的四通“佚信” .....	肖伊绯 (12)
<b>From the Dead Language of China to a New and Living</b> .....	By Hu Shih (14)
胡适 1924 年英文佚文《从死的文言到活的口语》 .....	沈雅婷 (19)
《胡适口述自传》(征求意见稿) .....	胡适口述 唐德刚整理 张书克重译 (21)
1955 年上海市高教界批判胡适的相关情况 .....	朱洪涛 (23)
胡适的几篇散佚文献 .....	肖伊绯整理 (26)
从实验学校到实验外国语学校	
——以胡适在艺文中学的三次讲演为中心 .....	肖伊绯 (29)
他人致胡适英文信函一束 .....	王波整理 (38)
居然跟“性博士”沾上了边——我与张竞生研究 .....	陈漱渝 (48)
《胡適時論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簡介 .....	胡適紀念館供稿 (52)



## 雷案风波中的胡适与蒋介石

耿云志

胡适在那篇试图总结蒋介石与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的文章——《斯大林战略下的中国》一文中，只从国际方面谈，而没有从蒋介石和国民党本身的方面谈。大概是想避免给蒋和国民党的领袖层的人们以太大的刺激。但自从那篇文章在台湾媒体广为传播以后，胡适还是经常强调，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就必须进行改革。他于1951年5月31日写长信给蒋介石，除了要蒋介石看看他的《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和注意研究敌人方面的材料以外，他还提出建议，要蒋介石考虑，让国民党自己自由分化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蒋介石自己则先辞去总裁的职位。胡适以为这样可以推动国民党走上自觉改革之路。蒋介石承认胡适的文章有价值，却不肯接受他的改革建议。1952年9月14日，胡适再度写信给蒋介石，重申他上面所说的内容，并进一步申说，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多党制，要确立这种基础必须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并且应当废除总裁制。他还希望蒋能够诚心地培植言论自由，在党的大会上表示出“罪己”的意思。蒋介石将胡适的意见讥之为“书生之见”<sup>1</sup>，完全不能接受这些说法和建议。

胡适与蒋介石两人，在思想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独裁者，一个是自由主义者。但在反共抗俄这个大局上他们是一致的。为了这个大局，胡适认为，国民党政府需要做很大的改革，以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为此，必须要改变一党政治为多党政治，需要培植言论自由。而這些，蒋介石是不能接受的。这就决定了，胡、蒋两人之间不断地产生摩擦甚至冲突。

胡适与蒋介石的矛盾冲突，最突出的还是在雷震的问题上。《自由中国》因争取言论自由，与政府当局屡起冲突，作为该杂志的实际负责人雷震，早已被蒋介石视为异己。后来，雷震又成为

酝酿和组织反对党的带头人，力图改变蒋介石与国民党的独裁体制。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极大警觉与憎恨，必欲严厉惩治雷震，以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终以莫须有的“通共”罪名，将雷震投入监狱。此即为震动中外的雷案风波。

雷震浙江长兴人，生于1897年，20岁赴日留学，曾入京都帝大法学部，主修行政法，毕业后，继入该校研究院专攻宪法。1927年回国，不久入政界，从南京市党部委员起始，陆续做过教育部总务司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等职。国民党败退时，他奉命以顾问名义协助汤恩伯守卫上海。那时，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有了很深切的认识。此人反共立场坚定，希望国民党认真改革，以求复振。他积极参与主持《自由中国》杂志即为此目的。但国民党的改革，毫无实际进展，他越来越看清蒋介石坚持独裁专制不可能自行改变。为打破这种局面，他逐渐明确必须建立反对党。

早在1956年10月，11月，雷震曾连续两次写信给胡适谈建立反对党，并希望胡适出来领导。<sup>2</sup>现在尚未见到胡适当时表示态度的材料。1957年8月28日，胡适在给雷震的信中谈到他个人从来“不拜客，不回拜客，不请客，不写荐书，近一二十年来又添‘不回信’，这样疏懒的人，最不宜于干政治。此我自知之明也。”<sup>3</sup>这是非正面地回答雷震上年给他的两封信。第二天，胡适又写信给雷震，更加明确地告诉雷震说：“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自己出来组织政党。”嘱咐他，切不可相信港、台一年来所传胡适与蒋廷黻，或张君勱等要组织什么政党的传言。一年来曾有不少港、台朋友劝胡适出来组党，他“始终没有回过一个字，没有复过一封信”。所以他告诉雷震：“千万不可假定胡适之可以（或能够）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但同时胡适也表示，他不反对其他人筹组反对党。

他说：“如果台湾真有许多渴望有个反对党的人们，……他们应该自己把这个反对党建立起来，应该用现有的可靠的材料与人才做现实的本钱，在那个现实的基层（础？——引者注）上，自己把这个新政党组织起来。”而不要把希望建立在胡适或张君勱等人。<sup>4</sup>

雷震以及其他参与建立反对党活动的人，除极个别的人（如傅正）以外，都并没有放弃胡适将来出面领导反对党，哪怕仅仅是做一个招牌的希望。不过他们也相信胡适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自己先做起来。一方面联络朋友，经常举行各种聚会，商量有关问题；一方面加紧舆论准备。

1958年2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八卷第四期发表社论《反对党问题》。

文章说：“三十年来实质上的一党政治，已渐渐使我们这一辈人丧失了全部的动力与活力”，所以，“这个一党政治却正好成了一切进步的阻碍。”又说：“今天的情形是：不仅政治为一党所包办，甚至全国的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也都为一个中心势力所掌握，任何新兴力量几乎没有成长的隙缝。”要想改革，要想进步，必须首先要解决这个一党政治的问题。文章指出，要实现真的民主政治，就必须改变一党政治为多党的政党政治。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出现健全的政党政治。”所以成立强大的反对党成为最切要的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曾连续发表论反对党的文章，单是以“论反对党”为题目的文章就作到《七论反对党》。其他与建立反对党有关的文章还有十几篇。其中有雷震亲自撰写的《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自由中国》第22卷第10期）。文章从当年的地方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一党操控选举，使党外人士及地方人士，被排挤在外的事实谈起，认为要使选举公平正义，必须有强大的反对党。文中还引孙中山的话，说明只有不同的党派互相竞争，政治才会有进步。他号召人们联合起来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而组织起强大的反对党。他要求国民党退出军队、警察和学校以及司法机关；国民党的党费不可由国库

支出；一切国民党的附属机构，如社会服务站、青年救国团、文化工作队以及学校的课外活动组等等组织一律撤销。总之，要求国民党要退居于普通政党的地位，与他党同依政纲、政策展开竞争。可以想象，数十年来一直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及其领袖，怎能容忍雷震此等要求？这时，已是1960年5月，雷震及国民党内自由主义人士，民社党、青年党中的一部分人以及一部分地方人士，组建反对党的活动进入倒计时。

胡适对于雷震一班人组建反对党，从一开始就表示赞成和支持，这与他一贯的自由主义信仰，和他一贯地争取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以及他参与创办《自有中国》杂志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但他深知自己不适合做实际的政治活动，不适合做政治竞争的领袖。所以，他一再拒绝出面领导反对党的建议。但雷震等人却总是寄希望于胡适。这是因为，第一，他和筹建反对党的朋友们都认为，只有胡适出来领导，才能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部分国民党人，民社党及青年党的一部分人以及台湾地方人士联合到一起，团结在一起。当时有一部分人，对于台湾地方人士参与反对党，很有疑虑，怕他们与其他人不易融洽。雷震说，只有胡适出来领导，“可以消灭台湾和内地人之隔阂，且可减少流血”<sup>5</sup>他在给胡适的信里也强调这一点。<sup>6</sup>台湾知名人士吴三连也认为，只有胡适出来领导，否则，反对党是组织不成功的。<sup>7</sup>胡适也知道，“只有民、青两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和台湾人合组反对党”<sup>8</sup>才好。他在有关场合也极力强调台湾人士与内地人士，“大家是在同一目标向前努力，无分彼此，中间是没有界限的”。<sup>9</sup>

雷震等所以一直期待胡适出来领导组织反对党的第二层重要考虑，是想胡适的崇高德望可以对新成立的反对党起到掩护的作用。雷震曾经很坦率地对一位参与组织反对党活动的朋友说：“如我被捕，美大使馆可能问一问，如王世宪被捕，不过五百名立委之一被捕而已。如胡先生被捕，则全世界震惊。”<sup>10</sup>确实，台湾当局，包括蒋介石在内，对于胡适，不管他们心目中如何不满意，乃至嫉恨，也不敢冒天下之不韪，将胡适逮捕入

狱。因为，美国人太把胡适当回事，他们把胡适视为台湾还可勉强算作“自由世界”的一部分的一个象征。把胡适关起来，美国断不会坐视不理。而蒋介石和台湾当局则断不肯太得罪美国政府，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蒋介石也曾预想过，在处理雷震案的过程中，如果胡适公开出面反对，将会陷入十分为难的境地。正因此，蒋介石才会利用胡适去美国出席学术活动的机会，将雷震逮捕。蒋介石还预想到，如果逮捕雷震后，胡适在美作出太不利于当局的表示，则可讽喻胡适不许其回台。<sup>11</sup>这大概是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所能做出的对胡适最大限度的惩罚了。

胡适不知道蒋介石对他怀有极深的嫉恨心理。我们从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看得出，蒋介石对胡适的嫉恨心理简直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我们知道，胡适1949年去美国是受到蒋介石的嘱托的。所以最初两年，尽管胡适在美对所托之事几乎无所作为，但彼此相安无事。从1952年冬胡适回台湾讲学开始，直至1960年雷震案最后判决为止，这八年左右的时间里，胡在蒋介石心目中几乎全是负面形象。（其中，只有1958年胡适回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前夕，与蒋介石一次谈话后，蒋氏觉得“对其研究学术与办理大学意见颇多可取”<sup>12</sup>。）例如，1952年12月13日，蒋介石与胡适面谈之后，对胡适批评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之说甚反感，因为胡适用以证明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的证据主要就是没有人敢批评蒋氏父子。蒋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至也。”<sup>13</sup>又如，1957年1月8日，蒋介石记道：“胡建中来函，胡适与其面谈“毁党救国”的主张，并由（有？——引者）反共救国会议修改宪法，解决国是之建议，殊出意外。此种文人政客真是无耻”<sup>14</sup>，是“宁为共奴而不恤也”<sup>15</sup>。最令蒋氏愤恨的是1958年4月10日，胡适在其就任中研院院长典礼后的院士会议上，公然批评蒋介石致词中的错误<sup>16</sup>。胡适认为，蒋氏的讲话至少有两点是必须加以澄清的：一是蒋氏说大陆共产

党批判胡适是因为胡适提倡并力行传统道德。胡适批评说，共产党批判他不是因为什么道德问题，而是因为胡适提倡不受人惑，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科学方法”。另外蒋氏说，中研院应当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以求其发展。胡适则说，我们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从学术上反共救国。一向唯我独尊的蒋介石，竟然在一群最有学问的精英们面前受到胡适如此露骨的批评，心理极为愤怒。当日记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今通译作鲍罗廷——引者）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应是就职典礼后紧接着举行的院士会议——引者）中之答辞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个妄人。”当日，“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安眠。”愤恨之余，蒋氏竟带诅咒的语气写道：“惟余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人世为虑也。”<sup>17</sup>5月30日又记道：“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欲望。经儿（指蒋经国——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sup>18</sup>在蒋氏的日记里，充满着咒骂胡适的语言：什么“投机政客”<sup>19</sup>，“无赖政客”<sup>20</sup>，“反动政客”、“无耻政客”“狰狞面目”<sup>21</sup>，“无耻之徒，反动敌人”<sup>22</sup>，等等，不一而足。

在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呼声日高的情况下，胡适希望面见蒋介石，当面陈说蒋氏不宜三连任的道理。蒋介石断然拒绝，并称：“此种无耻政客，自抬身价，莫名其妙。诚不知他人对之如何厌恶也。可怜实甚。”<sup>23</sup>最不靠谱的是，蒋介石竟然认为胡适反对他三连任的动机是“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sup>24</sup>。大概除了蒋介石本人，没有人相信胡适是怀着这样的动机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胡适不过是希望蒋介石不要做违宪的事，创立一个和平转移政权的风范，以利于民主制度

的进步。但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这一番道理的。

可惜，胡适完全想不到，蒋介石竟怀着对他如此深刻的嫉恨。所以，在雷震与反对党的问题上，胡适愿意给以道义的支持，这是大触蒋氏的忌讳的，是蒋氏及其集团所不能容忍的。

胡适在蒋介石周围，不乏一些很好的朋友，胡适应该可以较及时地知道蒋介石及其决策层的一些信息。所以，胡适对雷震组织反对党的支持逐渐有些变化。

1959年7月初，胡适去美国参加学术活动，雷震到机场送行时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当天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为胡适送行。这是同以往的情况很不一样的。这说明，蒋介石及其政府当局，已经不把胡适当作诤友了。我们可以相信，深谙人情世故的胡适，也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诚然，胡适始终没有改变支持雷震组党活动，但支持的力度，谈话的口气，是有变化的。1958年4月9日，4月20日，他曾两次对雷震表示，他可以参加雷震组织起来的反对党。<sup>25</sup>到同年11月29日，他仍然表示，只要雷震他们把新党组织起来，“他觉得好，可来参加”<sup>26</sup>。1958年5月，他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讲话里，还说到，雷震是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提议要给他铸铜像。

但到1959年，胡适两度谈论“容忍与自由”，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表明胡适的态度已发生变化。到1960年以后，情形有了更为明显的变化。1960年3月6日，胡适写信给雷震，寄给他写的《赫尔回忆录》的序，同时附上两封别人写给他匿名信，信的内容是警告胡适：说雷震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希望胡适不要跟雷震走，不要被雷震所利用。<sup>27</sup>胡适在信中特别提示：“下一期（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第22卷第6期——引者）的稿子措辞要特别小心。”<sup>28</sup>据胡颂平记载，6月30日，雷震同夏涛声来看胡适，请求胡适支持他们的反对党。胡适对他们说：“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

和人家斗争。如果你们将来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作领导。”<sup>29</sup>7月2日，在出席雷震等参与的“选举改进座谈会”（实际就是他们进行组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引者）举行的宴会上，胡适明确表示，希望他们不要把组织新党叫做“反对党”，还是叫“在野党”。8月4日，胡适给雷震写信，明白地指出，雷震和他的朋友们在组党过程中，不宜对国民党过于采取“攻击人”的态度。胡适说：“你们的党还没有组成，先就痛骂人，先就说要打倒国民党，先就‘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国民党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的党了。”胡适此信是在美国写的。信中还说到，千万不要等候胡适回台时再宣布成立新党。胡适说，早在出国前，五六月间，曾劝告他们不要把发表他们的《宣言》特意选在艾森豪威尔来台访问前夕发表。意思是不要刻意把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连在一起。这是不诚实。胡适责备雷震说：“我举此例子，表示你们的想法、看法、做法，我往往不能了解。我的想法、看法、做法，你（单指你老兄——原注）也往往不能了解（别人更不用说了）。”<sup>30</sup>胡适写此信之后一个月，正当反对党即将正式成立之前，雷震及《自由中国》社的刘子英、马之骥、傅正四人被捕入狱。

胡适对雷震组织反对党的鼓吹与行动，由积极赞成到有保留地支持，以至不希望雷震把反对党的成立与他本人直接联系起来。表面看来，似是胡适因畏惧当局，为避祸而趋消极。我个人认为事情不是如此简单。我觉得，胡适支持成立一个能对执政的国民党起监督作用的反对党（胡适的意思最好叫在野党。其实，或许叫反对党更符合民主政治的本质），目的是维护一个稳定的反共基地。如果因反对党的问题，影响到这个反共基地的稳定，他是不会给予积极支持的。他的一贯原则是对蒋政权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具体到他本人，对蒋政权，批评与谏诤，不能闹到决裂的地步。胡适不知道蒋介石内心对他那般嫉恨，他想不到蒋介石会对他采取什么极端手段，所以

不存在畏惧与避祸的问题。从雷震被捕后胡适的公开表态来看，他没有一丝一毫肯定蒋介石的做法。蒋介石给雷震定的罪名是“通共”，而“通共”就是“叛乱”。此罪名的由来，是雷震出名担保并收留来自大陆的一个叫刘子英的人在《自由中国》社做会计。国民党特务部门逼迫刘子英承认自己是中共特务。雷震担保并收留中共特务，就构成了“通共”罪，也就构成了“叛乱罪”。其实蒋介石之所以要惩治雷震，主要是两条：一是他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不断发表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极其尖锐，如《取消一党专政》、《我们反对军队党化》、《“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国库不是国民党的私囊》等等。这些极为尖锐的批判都是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这是在舆论方面反蒋，反独裁专制。这已经让蒋介石受不了。而在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的问题上，《自由中国》半月刊尤为旗帜鲜明。照傅正的说法，“《自由中国》半月刊坚决反对老蒋三连任，即是后来雷案的祸根”。<sup>31</sup>从蒋介石日记看得出，早在1957年，蒋介石就开始注意《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问题。对其与美国在台机构与人员之间的的联系，可能接受其津贴一事尤为敏感，对其与台湾地方人士的联系也十分警惕。因此，已把该杂志列入反动杂志，1957年8月，已开始与相关部属研究对该杂志“破坏国策之罪案”进行的处理问题。<sup>32</sup>到1960年7月，蒋氏已决心处治《自由中国》杂志，认为“《自由中国》半月刊，雷逆反动，挑拨台民与政府恶劣关系。如不速即处置，即将噬脐莫及，不能不作最后决心也。”<sup>33</sup>

如果说，《自由中国》是雷震用来在舆论上反蒋，反独裁；那么组织反对党，就是从行动上反蒋，反独裁。这是蒋介石尤其不能容忍的。

但是，办杂志批评政府，批评蒋介石，以及组织反对党，都不能拿到台面上作为罪案，于是只有另寻途径，构陷罪名。他们从刘子英下手，逼成雷震容纳共谍，知情不报，等于“通共”的罪案。刘子英承认自己是共谍，并已告知雷震自

己的身份。蒋介石得到这个供词的报告时，非常兴奋。且看蒋介石日记：（1960年）“9月6日，主持情报会谈，据雷案之刘子英自供，其由匪共派来联络雷逆，且其初，已明告雷逆，而雷仍包庇不控，且容留在家，并派定为自由中国刊之会计也。其通匪之罪确立矣。”“9月7日，主持中央常会，指示乃建，雷案主要问题，因转移于刘子英匪谍与雷有重大关系方面，而以其社论叛乱涉嫌为次要矣。”（9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雷案中刘子英已自认其为匪谍，此一发现甚为重要。”后来暴露出来的事实证明，刘子英的供词完全是被诱逼而成的。<sup>34</sup>

胡适即使心里明知刘子英供词是假的，他也无法就此立说，他只有凭他个人对雷震的了解，坚信雷震是“反共爱国”的。

雷震被捕的当天，时任“副总统”的陈诚就发电给胡适，告知消息。胡适当即复电称：“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可预言：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公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傲寰爱国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尊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乞公垂意。”<sup>35</sup>胡适根本不相信政府当局给雷震等人妄加的罪名，明确指出客观反响肯定不利于政府当局。他要求雷案应当交付司法审判，而不应由军法审判。因为全世界都不相信军法审判的公正性。

雷震被捕三天后，美联社记者电话采访胡适，胡适答称：“我认识雷震多年，……他是一位最爱国的人士，自然也是一位反共分子。他以叛乱罪逮捕，乃是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我不相信如此。”“我对这件事的发生很感遗憾。”十天以后，他对合众国际社记者做了同样的表示。强调雷震是爱国反共人士。<sup>36</sup>

9月21日，胡适在纽约接见台湾《公论报》的记者也仍然强调，雷震“是一个反共爱国分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又说：“事到如今，我仍旧觉得在‘反共’‘爱国’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sup>37</sup>

10月8日，雷震被军事法庭以“通共”“叛乱”罪，判决十年监禁。

10月22日，胡适回到台湾。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包围。他的回答，仍集中在相信雷震是一位爱国反共人士。他说：“我和雷震先生相识多年，我自信至少有资格做这个证人，来证明雷震是爱国反共的人。”又说：“雷震已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sup>38</sup>

胡适在美国的言论，以及回到台湾时，在机场对记者的谈话，肯定令蒋介石不满。他在日记中，屡次记及胡适对雷案的态度：10月13日：“胡适定于16日（实际是10月18日）从美国动身，19日飞到东京，有毛子水等专程到东京迎接，22日始回到台北——引者）回来，是其想在雷案复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骂胡适是“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蠹贼”。10月29日：“昨（28）日上午召见岳军与（汪道渊）复判局长，指示对雷案速判的要旨。为胡适无赖卑鄙之言行考虑，痛苦不置。其实对此等宵小，不值较量，更不宜痛苦，惟有我行我事，置之一笑，则彼自无奈我何矣。”<sup>39</sup>

雷震一案，实际上也是蒋介石对付胡适的一次较量。因为无论《自由中国》杂志，还是反对党，都与胡适有很重要的关系。蒋介石既不能惩治胡适，但总要就雷案与胡适有所交代。可台面上又不好专就此一事召见胡适。于是他想出就胡适率团赴美参加重要学术会议，在美停留将近三个月，现在回来了，胡适应当有所报告才是。按，胡适此次出国是完全由政府支付经费，其21名成员全部用的官员护照，临行前，蒋介石还曾亲自设宴为之饯行。有这样一些官样程序，胡适理应面见蒋介石，对其出国之行作出报告。

11月18日，胡适应召见蒋，在做了程序性的谈话之后，胡适谈起雷案。他首先说，政府不会“深知”雷案在海外引起的不良影响，因为当局的主要官员（包括蒋介石、陈诚等）都没有出过国，故无法“深知”海外的不良反应。特别是用军法审判，又是十分匆忙地审判，海外无人相信。这种做法让胡适感到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胡适如此表示，显然是没有站在政府当局的立场上。蒋氏遂说起他曾对某人说起，胡适近年来只相信雷震而不相信政府。希望某人把此意转达给胡适。但胡适从未听过有人转述此话给他，他觉得蒋氏此话分量太重，不能不加以辩驳。他重新提起当年蒋介石从大陆败退时，胡适曾郑重宣布：“我愿意用我道义的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那儿去！”胡适说：“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傲寰说过。”胡适又进一步说到他回台后，曾接受台湾地方人士邀请吃饭，也特别嘱咐他们：要延缓成立新党的时间，更要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的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胡适并婉转提到十年前，蒋氏曾希望胡适组织一个政党，现在胡适盼望蒋介石能把对胡适的雅量分一点来给今日要组党的人。

这里所记述的胡适与蒋介石的谈话，即可表示胡适相信雷震不是“通共”、“叛乱”者，不相信军法审判的公正。也表明他虽然支持争取言论自由，支持成立反对党，但他始终不忍与政府决裂的苦心。

当日，蒋介石是这样记述他与胡适见面谈话的过程。他记道：“11月18日，召见胡适，约谈三刻时。彼最后提到雷震案与美国对雷案舆论，余简答其雷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依本国法律处理，不能例外。此

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否则政府无法反共，即使存在，亦无意义。余只知有国家而不知其他。如为国际舆论则不能再言救国矣。此大陆沦陷之教训，不能不做前车之鉴也。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系，彼或有所感也。”这里，蒋氏自觉完全是胜利者的高姿态，使胡适颇为受窘。然而，以我们史学家的后见之明看来，形势却是沿着胡适、雷震所预想的方向发展的。

2018年10月27日完稿

附言：写作本文之前，承蒙杨天石先生惠借其手抄“蒋介石日记”（1950-1961）。志此，以表谢意。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 1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册，第102页，台北，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
- 2 见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98—101页，第106-109页。台北中研究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 3 胡适致雷震（1957，8，28），同上，第115页。
- 4 胡适致雷震（1957，8，29），同上，第116、119页。
- 5 《雷震日记》1958年8月2日，傅正编《雷震全集》第39册第346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6 雷震致胡适（1958年8月14日），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13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 7 《雷震日记》1960年3月21日，傅正编《雷震全集》地40册第275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8 《雷震日记》1960年3月16日，傅正编《雷震全集》第40册第270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9 《雷震日记》1958年6月12日，傅正编《雷震全集》第39册第308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10 《雷震日记》1958年5月31日，傅正编《雷震全集》第39册第299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11 蒋介石日记，1960年8月31日。
- 12 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9日。
- 13 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3日。
- 14 蒋介石日记，1957年1月8日。
- 15 蒋介石日记，1957年1月9日。
- 16 按，蒋介石的谈话载次日之《中央日报》
- 17 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 18 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 19 蒋介石日记，1958年6月3日。
- 20 蒋介石日记，1958年12月22日。
- 21 蒋介石日记，1958年12月31日。
- 22 蒋介石日记，1959年1月29日。
- 23 蒋介石日记，1959年11月20日。
- 24 蒋介石日记，1959年11月27日。
- 25 《雷震日记》，1958年4月9日、4月20日，傅正编：《雷震全集》第39册第263、272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26 同上，第414页。
- 27 《雷震日记》1960年3月7日，傅正编《雷震全集》第40册第256页。
- 28 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226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 29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05-330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 30 胡适致雷震（1960，8，4），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23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 31 《雷震日记》1960年3月6日，傅正编：《雷震全集》地40册第272页，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
- 32 蒋介石日记，1957年8月13日。
- 33 蒋介石日记，1960年7月23日。
- 34 刘子英是蒋介石与台湾当局构陷雷案的关键人物。服刑12年后出狱，1988年离开台湾回大陆探亲，行前给雷震夫人宋英写了一封表示忏悔的信。此信极端重要，故录其全文如下：  
雷太太：  
我实在愧对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趁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做公（雷震字傲寰，其朋友和同事尊称做公——引者），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被人讥笑怒骂自是应该。所幸社会人士大多明白这是怎样一桩冤狱。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现在我要到大陆探亲去了，特将写就“辩诬”一文寄呈，以明心迹。如要公诸社会，致以动乱不安之情势益形扩大，则非所愿也。今天再谈正义讲公理似乎不合时宜，一切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断，则或可不畏权势直言无隐，使真相大白也。  
敬请  
善自珍摄  
刘子英敬上 七十七年八月。
- 35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3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 36 同上，第3336页。
- 37 同上，第3337页。
- 38 同上，第3343、3344-3345页。
- 39 蒋介石日记，1960年10月13日、29日。

（此信引自聂华苓：《三生三世》第306-30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 《胡適全集》序言

潘光哲

胡適（1891-1962）在廿世紀的華人社群裡，始終扮演領航者的角色；他的生命旅程和思想世界刻鏤的多重軌跡，更是華人社群瞻望未來進程的時候，足可汲引的思想資源，與時長新。在華人世界裡，環繞著胡適的話題，訴說不盡，未曾間斷，彰顯了他必然是理解歷史趨向不可或缺的要角，也象徵他一直是人們感到興趣的人物。

胡適的生命史與思想歷程，胡適信守堅持的理念，胡適努力以赴的事業，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啟發意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當然需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努力。如何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實現胡適對傳記書寫設定的要求：「紀實傳真」，「紀實傳信」，寫出胡適的「實在身分，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尚友其人」，正考驗著史學工作者的技藝。然而，胡適自身遺留的文字遺產，卷帙浩繁，令人望洋興嘆；更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因素，胡適個人的檔案資料與文獻，分散於台灣海峽兩岸（乃至於世界各地），利用匪易。

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始建於一九六二年，是紀念、弘揚胡適思想和精神的基地。創建之始，胡適紀念館即有意整理編輯胡適著作，只因莫可奈何的時代限制，斯業難成。所幸，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胡適獨特的人生道路，終於不再蒙受重重迷霧的籠罩。假此機緣，整合編輯分散於各方的胡適史料和檔案，胡適紀念館責無旁貸。胡適紀念館目前已經建立利用電腦網路檢索的「胡適檔案檢索系統」，讓相關的史料檔案，愈形方便整理應用。不過，要讓胡適在歷史長河裡貢獻的心血，「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要讓胡適對華人社群的啟發意義，日新又新，仍然必須以堅實的史料文本為基礎。基於這樣的信念，自從二〇一三年開始，胡適紀念館正式啟動新版《胡

適全集》的編輯出版事業，以「精益求精，後來居上」為目標，期可為學界提供最完整（毫無刪易）與最精確（匯總各種版本，進行編校）的胡適著作文本，以利用。新版《胡適全集》既擬刊布胡適生前已出版之著作單行本的最佳版本，更致力發掘胡適未曾集結之文章著述，依據主題，期可總匯為一帙。胡適紀念館期望，無論對學者或對一般讀者而言，新版《胡適全集》都是研究和親近胡適最為方便與準確的依據。

胡適晚年告誡和他師友關係深厚的楊聯陞（1914-1990），學生替老師編定詩文遺集的時候，應該「要用自己的判斷力」決定去取，「不要把隨便什麼東西都收進去」。胡適還以「你們後死有責」，期望於為他編定著作集的後來者（〈楊序〉，《胡適手稿》）。新版《胡適全集》務求全面、完整與廣泛地輯錄胡適的著作和相關文本，「多多益善」，當然和他的期望，難合符節。可是，返觀胡適自己的學術實踐，他在晚年提出了「勤、謹、和、緩」做為「治學方法」的「四字訣」，認為「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實，勤求證據」（〈致陳之藩〉〔1957年5月2日〕），心得理據之所在，正是自己「一以貫之」的治學原則。如胡適為了證明《儒林外史》裡的莊徵君即是程廷祚（1691-1767），開始搜求他的著作。即使胡適找到了程廷祚的《青溪文集》十二卷本，仍然意有不愜；要到孫人和（1894-1966）出示二十卷本的《青溪文集》，才讓他的心願，稍感滿足。利用北京大學重印《青溪全集》二十卷本全帙的機會，胡適還特意補充了好些相關的史料（〈北京大學新印程廷祚《青溪全集》序〉），願意將自己的發現，與世眾共同分享。以胡適自身的學術實踐為原則，推出這套新版《胡適全集》，即便違逆了他的心願；然而，「實事求是，莫做調人」，既是胡

適喜歡送給真理追求者的座右銘，後來者自當懷持敬慎之心，體會他的意旨和為學之道，進行這項既是責任也是榮譽的工程。

歲月悠悠，浪起潮落，胡適的時代已遠，胡適的墓木已拱。只是，做為「人」的永恆問題與現實的挑戰，無時或已。胡適期待的理想世界，和我們的夢想處境，不可能一成不變；胡適回應自己時代問題的解答，也不會是我們面對自身現實的萬靈丹藥。胡適的遺澤所在，不是他提供了解決人生問題的標準答案，設定了突越生命困境的金科玉律。相對的，叩問追索胡適多彩多姿的生命歷程，體驗品味胡適獨特鮮明的精神遺產，

從他那裡學習「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的思想工夫，總有「功不唐捐」的結果。正如胡適說過的：「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穫，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期望新版《胡適全集》，確實有助於後起者進入胡適豐富多樣的生命和思想世界。我們知道，一切工作之所得，至善實難，錯訛仍多，謹此敬望 學界讀者的批評指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兼胡適紀念館主任

潘光哲 敬序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 胡适写给吴相湘的两封未刊书信

邹新明

2013 年，笔者有幸到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交流一年。工作之余，留心调查了解该馆藏胡适书信手稿，并加以整理注释，于 2014 年初编成《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适书信手稿》书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书稿一直未能出版，笔者当年在波士顿租住的小屋中整理此书稿的情形历历在目，而转眼之间已经历近五个春夏秋冬。

手稿中收录有胡适写给吴相湘的五封信，日期分别为 1954 年 12 月 18 日、1958 年 11 月 21 日、1959 年 3 月 4 日、1960 年 5 月 28 日、1960 年 12 月 25 日。

经笔者核查，1958 年 11 月 12 日一信，据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检索数据库”，此信纪念馆藏有钞件。胡适 1958 年 4 月到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此信应为其秘书胡颂平钞录存档。1959 年 3 月 4 日一信，胡适纪念馆藏有胡颂平钞件，另分别收入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全集》第 26 卷。1960 年 5 月 28 日一信，胡适纪念馆藏有胡颂平钞件，另收入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上三封之外，1954 年 12 月 18 日及 1960 年 12 月 25 日

两封书信，不见于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检索数据库”、《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全集》，应未在书刊和数据库中发表。兹略作介绍，并抄录全文，与同好分享。

吴相湘（1914-2007），湖南常德人。1937 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就职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沙工作站。1941 年冬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编译股编纂战史。1947 年任国立兰州大学副教授。1948 年秋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纂。1949 年初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1965 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1969 年回台湾，任台北市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1975 年赴美国定居。2007 年去世。

吴相湘 1933 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胡适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吴氏得亲炙，并于 1935 年求得胡适亲笔题“持其志毋暴其气，敏于事而慎于言”墨宝。胡适与吴相湘开始比较多的书信往来大致始于 1954 年。吴相湘曾有回忆文章《胡适之先生身教言教的启示》，涉及书信交往的一些内容。<sup>1</sup>

哈佛燕京图书馆吴相湘藏胡适书信等资料，应为吴氏本人捐赠。在这批资料中，有两封吴氏

1986年5月10日、6月26日给时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的信，均为捐赠资料给哈佛燕京图书馆事，由此可以大致证明。

胡适1954年12月18日写给吴相湘的书信，是对吴相湘同年8月17日来信的回复。吴相湘在《胡适之先生身教言教的启示》一文中介绍了写此信的起因：“北平友人将我存放旅寓的故宫博物院文献丛编二十余册，经香港转寄来台湾。其中有若干康熙朝杭州织造李煦奏折，陈述曹寅家后人情况；我因撰成《故宫档案中所见曹雪芹先世事迹》发表于《畅流》半月刊。后阅及大陆新刊周汝昌着《红楼梦新证》后颇多感想，因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寄信胡先生陈述，并将上述拙文寄呈请诲正。”吴氏此信藏于胡适纪念馆，主要内容是谈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后，对大陆清算胡适思想、以及该书的感想。胡适在回信中肯定了吴氏的意见，称周汝昌是自己《红楼梦》考证“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胡适不但以周氏书中对自己的大骂为忤，反而寻找其中隐含的对自己的谢意，而且认为周氏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也是故意为之，甚至因为觉得周氏此书接受自己的成分太多，担心他难逃遭清算的厄运。此信表现出胡适对大陆批判胡适运动的一贯态度，即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影响非常自信，对于批判者寄予同情，认为他们多是被迫为之。此信全文如下：  
相湘兄：

八月十七日的信，至今未复，乞恕之。

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我完全同意。

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方面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他在书的前面虽然大骂我几句，但他在许多地方对我致谢意，是很明显的，但可以暂时逃避文化特务的侦缉而已。例如P.30八行：“诸收藏家对我的慷慨和厚意，我永不能忘怀，而我的感幸也远非言语所能表达。”他提出的甲戌本脂砚斋评本，是我借给他兄弟二人去全部影抄的，《四松堂集》是我临走时故意留赠给北大图书馆使他可以用的；裕瑞的稿本是孙子书送给我，我又送还他的。

你信上说，看了周君的书，“深感共□清算胡

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我早已为此一点替这些朋友们担忧。我所以不写《新证》的书评，也是不愿意给他们惹祸。但祸还是惹了。俞平伯为《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辨》改名）竟遭“全国文艺协会”开了八次会，讨论的结果是宣告平伯“有罪”（“Guilty of Propagating Dr. Hu Shih's bourgeois idealism in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novel *Hung-lou Meng*”，Dec. 10, 1954的 *New York Times*）十月廿四日（？）北平的《人民日报》等有周汝昌批评平伯的长文，当是被迫为之。

我看汝昌与一切信“新红学”的人迟早总不免被清算。在许多攻击平伯的文中，为俞书作序的颀刚已提到了。周君书中接受我的成分太多，我怕他总难逃清算之厄。

有二事奉询：

(1) 文化服务社印的孟心史先生《清史讲义》，如尚可买，乞代买一本寄来。

(2) 吉忱故后，那部《红楼梦考证》文字汇本仍在印否？已出版否？如已印出，乞嘱印所寄几部给我。

匆匆敬祝新年安吉

适之

四三，十二，十八

那尔苏一条，我也赞同。但我也未见心史先生说。

元春一条，我也怀疑。曹家之败似与夺嫡事有关。

胡适1960年12月25日给吴相湘的信，起因是1960年12月17日在台北举行的北大六十二周年校庆活动上，胡适被李石曾问及为什么他的生日与北大校庆同一天，由此引发12月17日是1898年开办时候的校庆日，还是1902年重新开办时候的校庆日的疑问。胡适在当天的讲话中请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会后吴相湘和劳干都查考到一些数据。胡适此信是对吴相湘关于此事来信的回复。胡适在信中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剖析，列出戊戌年关于大学堂的几个重要日子，最

后认为“大学堂的成立日子似应以五月十五日（1898年七月三日）为最妥帖。”此外，胡适还基本确定了老北大的12月17日校庆，应是1902年大学堂重新开办时开学的日子。此信长达八页，两千余字，是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和北京大学校史的重要资料。另胡适于写此信的次日，即12月26日，写成《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一文（发表于1961年1月1日台北《民主潮》第十一卷第1期），文中还参考了劳幹提供的材料，最后结论是有三个日期有资格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的纪念日，可与此信参看。此信全文如下：

相湘兄：

谢谢你的信。十二月廿日的信，我前天在一个酒席上已给子水，静农等许多北大同学看了。当时我就有意查光绪《实录》，昨夜回家，始见你已查过《实录》了。

房兆楹的孙家鼐传（Hummel: Vol. II, p. 674），已说，京师大学堂 was founded on August 9 [1898], and Sun Chia-nai was named the first president, Dr. W. A. P. Martin being made head of the faculty. 八月九日 1898 即戊戌六月廿二日甲辰（昨函误作廿一日）。你查得是日谕内阁，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一折，所拟章程八条（？八十条？）……尚属妥协，……即着孙家鼐按照所拟各节认真办理，以专责成。其学堂房舍，业经准令暂拨公所应用，交内务府量为修葺。着内务府克日修理，交管理大学堂大臣，以便及时开办，毋稍推迟。……

故 Aug. 9 是批准大学堂章程之日。

你考定戊戌六月初二日甲申（即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昨函误作二十一日。）乃是准“奕劻，许应骙奏请将地安门内马神庙地方空闲府第作为大学堂暂时开办之所，……着总管内务府大臣量为修葺拨用”的日子。

更前几天，——戊戌五月十五日（即一八九八年七月三日）有旨命孙家鼐管理大学事务，即是“第一任校长”。

更前几天，——五月八日庚申（即一八九八年六月廿六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据你十二月廿日函引“七十年来教育记

事”）此是第一次拟的章程，即六月廿二日甲辰谕内所谓“前拟定办法”。六月廿二日批准的孙家鼐奏上的章程，乃是梁任公代拟的，见《戊戌政变记》，引见《任公年谱》上，页60。

故这四个日子：

戊戌五月八日（1898年六月廿六日）批准初拟的大学堂章程。

戊戌五月十五日（1898年七月三日）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

戊戌六月初二日（1898年七月二十日）批准马神庙校址。

戊戌六月廿二日（1898年八月九日）批准重拟的大学堂章程。

这四个日子都可以说是大学堂创立的日子。

《教育记事》载“六月二十二日，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旋派余诚格为总办，丁黈良为总教习，置仕学馆，即以景山下四公主府为基址”。这个“旋”字似不正确。看《实录》六月廿二日上谕甚长，其中已提到“至派充西学总教习丁黈良，据孙家鼐面奏，请予鼓励，着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可见丁黈良（与余诚格）之委派，及仕学馆的设立，皆在五月十五日孙家鼐任管理大学堂大臣之后，六月廿二日奏报“筹办大概情形”之前，皆是“筹办情形”的一部分。故大学堂的成立日子似应以五月十五日（1898年七月三日）为最妥帖。你看如何？

房兆楹兄文中还提到丙申年（1896）李端棻之奏折，此公是任公先生的妻兄，其奏折似也是任公起草的。《政变记》所谓“即此一事（大学堂）……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故李折也是大学堂史料之一。

你的十二月二十日信中“[戊戌年]似大学堂曾开学”，此点似不必疑。房君留下的“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原件之中，有光绪丙午（一九〇六）“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有长沙曹广权（代理总监督）序文，中说，“戊庚之间同学名册散佚，不可求矣。”可见戊戌大学堂已开办，已有学生。此是一证。戊戌已有管理大学堂大臣为孙，总办为余诚格，西学总教习为丁黈良，是二证。夏孙桐“书孙文正公事”（《碑传集补》一，17-18）说：

“孝钦训政，罢新法，悉复旧制，独留京师大学堂一事，以公为管学大臣，公举黄学士绍箕为总办，事多依之。所用多翰林旧人。时朝廷方戒更张，姑以兴学饬时望，而枢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等犹嫉视，时相齟齬。赖荣文忠调护，未罢。”此段不但说明大学堂何以独得留存，并且记黄绍箕（仲弢，瑞安人）为新法既倒后的“总办”。（Hummel书一，343黄少箕传，则似误把他认作大学堂初创时期的“Chancellor”，似不确。）此是三证。你看还有别的证件吗？

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确是大乱后壬寅年（1902）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堂重开学的日子。大学堂原有仕学馆及预备科，师范馆是张百熙管大学堂时的新设置。师范馆又有旧班与新班之别，旧班当是壬寅新招的，新班当更在后了。邹树文君（在大学堂名应蕙，属于“师范馆第三类分科，习英文”。）是师范旧班，丁未年（一九〇七）毕业。他在北大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里，曾指出“十二月十七日”似是壬寅复校开学的日子，他说他记的初入学时，每天点蜡烛吃早饭，开学后不久就放年假了。你查得的数据可说是证实了他的记忆及假设了。

寄上我写的房兆楹《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的序文，其中有指出邹君记忆力不差的几点。此文我有副本不必还我了。

谢谢你为此一题搜得这许多材料。你的两函都有小误，上文已指出一二处。十二月廿日函中，记戊戌阳历皆误作1900，皆是1898之误。昨函中戊戌六月癸未朔，你原注七月十九日，不误；改作二十日，与援庵《朔闰表》不合。又六月庚寅，你注“初七”，当作“初八”；原注七月26日，则不误。又六月癸巳，注“初十”，当作“十一”；又六月戊戌，注“十五，3日”，当作“十六，Aug. 3日”。

敬祝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适之

四十九，十二，廿五日下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1 吴相湘《胡适之先生身教言教的启示》收入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二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

## 胡适的四通“失信”

肖伊绯

近日，笔者闲阅故纸，在一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报刊中，偶然发现报刊所载的三通胡适书信，均为《胡适全集》《胡适书信集》所失载的“失信”。且《胡适日记》《胡适年谱》亦均未对这三通书信，有过任何记载与说明，实属久已湮没无闻的史料文献。为此，笔者不揣陋简，酌加整理，按发表时间为序，转录原文如下：

（一）

记者：

前几天有一位“豪”先生对于我的北大开学演说有点不满意，曾在《晨报》发表一篇文章。

我觉得他有许多误解的地方。我现在病中，不能作文章，可否请先生们把我的演说原文章登出来，使人知道我这番话都是专为北大学生说的，使人知道我反对的“普及运动”并不是平民教育一类的事，乃是“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你递给我，我递给他”的“互钞运动”。我希望全国的有志青年细细的想想我说的“只有提高是真正普及”一句话。

九、九、二一

## (二)

旭初先生：

去国九年，归来远承盛意欢迎，十分感谢。今夜又得读七月廿五日航空函，知省府有搜集全省石刻展览之盛举，承远道征文，并囑题笺。因期限已迫，不及作文，敬题特刊签字，久不执毛笔作字，愧不能惬意，姑且奉寄，敬答厚意。昔年遍游桂林、阳朔、柳州诸岩洞，最萦念于元祐党籍两碑，与张孝祥、张栻、范成大诸公题字，与狄青平蛮碑。甚盼省府能利用今日摄影新法，早日编印成书，以饷全国学者。匆匆奉复，敬祝大安。

胡适敬上

卅五年八月十四夜

## (三)

邵先生：

谢谢你的信。

对于你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当此学术饥荒的年成，每一个有志青年必须努力学好一种重要外国文，才有生路可走”。这件事并不难，只须一两年的苦功便可做到。这条路是靠自己的，所以还容易做到。此外只好我们焚香告天，原天多生慈悲的学者给我们快快地介绍学术了。你还是靠自己努力罢。

胡适，十九，十，十七

## (四)

我知道本校同学们对于被捕的孟宪功、李恭贻两同学很挂念。所以昨天上午我曾送一些食物由警备司令部转交他们，并说明要他们给我一封亲笔信，使我好放心。他们昨天上午都写有亲笔收条给我。下午，他们又各写亲笔短信道谢。信里都说他们的生活很好，要我们放心。我现在把

这两封信全文印出来给同学们看看。原信两封存在校长室。

弟胡适三十六年十一月六日

上述第一通佚信，为胡适于1920年9月21日致《晨报》记者的一通信。信中胡适针对一位署名“豪”的读者对其讲演的批评，做了简明的解释，并提请《晨报》全文刊出其讲演稿，以明真相。此信于1920年9月23日，在《晨报》上刊发，信文之后，即附有胡适“提高与普及”讲演稿全文。

上述第二通佚信，被收录于《广西石刻展览特刊》。1946年9月，在时任广西省主席的陆军上将黄旭初（1892—1975）的支持之下，“广西省历代石刻展览会”隆重举办。当年10月，满载着名流致辞与考证论文的《广西石刻展览特刊》也应运而生。卸任驻美大使一职不久，在美国从事外交工作九年之后归国的胡适，不但应邀为这本特刊题笺，还曾于当年8月致信黄旭初，再次表达了他对广西石刻的关注。

上述第三通佚信，为胡适于1930年10月17日致邵存民的一通信。信中胡适针对邵之前的来信，予以简要应答。此信于1930年10月28日，在《京报》上刊发，胡适信文之后，附有邵存民致胡适信文，原题为《读书问题【胡适之君覆邵存民函，附邵存民原信】》。

上述第四通佚信，为胡适于1947年11月6日致北大全体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当日张贴在校内，广而告之。此信于次日（1947年11月7日），在《华北日报》上刊发，为一篇报道内容之一，原题为《北大昨布告学生，制止集众游行》。

（作者现居成都）

## From the Dead Language of China to a New and Living

By Hu Shih

[When Hu Shih commenced to advocate the use of *peihua*,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hina for literary purposes instead of *Wenli*, Chinese scholars denounced him. They said that he opposed *Wenli*, since being a returned student, he knew no classics. He thereupon published his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cknowledged by young and old, by scholarship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s a masterpiece. Curiously enough this book,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a best seller in China, a fact which cannot be disregarded by the student of intellectual forces in this country. Dr. Hu’s book in Englis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China,” is regarded in Europe and America a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philosophy. In his Wycliffian efforts to use a living tongue as a literary medium, Dr. Hu has written poetry of unquestioned excellence in the country of Li Po and Tu Fu. He used the spoken language as his medium because he finds it more colourful, but also because he wants to be read—he wants the people of China to read. His friends call his movement,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 graduate of Cornell and Columbia Universities, Dr. Hu at 31 was Dean of Faculties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in Peking.]

We know for certain that as early as the second century B.C. the classical language of China had ceased to be a living tongue. About 120 B.C., a great statesman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erial edicts and laws written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ere no longer intelligible even to the petty officials whose duty it was to interpret them to the peopl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serious difficulty, the ingenuity of the Chinese mind then invented that wonderful system of state examinations which required of all candidates for public offices a knowledge of the classical works. This system, gradually modified and improved as time went on, has been a most effective

means for encouraging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hroughout the empire. For two thousand years this long dead language has continued to be the official and literary language of China. As long as the literati were willing to submit to the discipline of mastering the classical writings in order to win official honours and political advancement, it never occurred to anybody that it was unnatural to use a dead language for all public instruction, official pronouncement and literary composition. And as long as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was considered, not as a necessary equipment of every citizen, but only as a special distinction of the select few, it was no wonder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never seriously raised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over 20 centuries.

### Pressure from Without.

But a time came when the problem could no longer be ignore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uropean Powers on the shores of China and with the gradual recognition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and of their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 new age of national life was ushered in. During the several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of the consequent humiliation on the part of China, practically all Chinese institutions were subjected to a test more severe and ruthless than any they had ever undergone in the ages past. It was a test of fitness to survive, of the ability of every institution to adapt itself to the novel conditions of a changed world. Many institutions succumbed before this supreme test and were replaced by new forms. Some were readily transformed; others were reformed with reluctance and even with bloodshed; still others have resisted the change to this day.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one of those more conservative institutions which have sought to avoid a radical change by exerting

themselves to meet the emergencies of the time. We shall briefly tell the heroic efforts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in its last days of glory before we proceed to describe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ese recent years.

With the dawning of the new national experience in China, the classical language suddenly found itself called upon to perform new duties and functions which it had never dreamed of during the many centuries of its long life. It was required to name new things and outlandish ideas, to import modern science, to introduce European philosophy, to translate modern novels and dramas, to carry on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and propaganda, and above all to educate, not only the select few, but the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In all justice to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e must say that it has made a truly heroic effort and has, in spite of all limitations and difficulties, succeeded fairly well in a number of its new trials.

In the field of introducing moder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Dr. Yen Fu (严复) stood out as the most successful translator. He employed classical Chinese in translating Montesquieu, John Stuart Mill, Huxley and Herbert Spencer; and he has succeeded in forcing these thinkers upon the reluctant intelligentsia of China by the dignity and elegance of his style. Indeed it was he who has made some of the technical term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so popular that they became proverbial expressions among the educated clas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ng the masterpieces of European literature, we must mention Mr. Lin Shu (林纾) as the most notable example of translators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In the course of 25 years Mr. Lin, who knows not a single word of any European language, has translated over 150 novels by English, French and American authors. He has done this with the aid of assistants who translate the texts for him first into the spoken language which he then puts into the classical style. It certainly sounds very queer to read the mediaeval heroes of Sir Walter Scott, the thieves of Dickens, of the Zulu chieftains of Rider Haggard talking in the style of Ssu-ma Chien and Han Yu. But we must

realize that Mr. Lin was the first to introduce western literature into China and that, like the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s of Dr. Yen Fu, these early translations in the ancient style have had the effect of sugar-coating for the dull palate of the conceited Chinese literati.

### **Liang Chi-chao's Great Work.**

The man who has done most in the great experiment of using classical Chinese for political and propagandist writings is Liang Chi-chao (梁启超). Mr. Liang w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after the *coup d'état* of that memorable year he lived many years as an exile in Japan. From Japan he sent to the coast and interior of China his powerful writings which took the form of classical Chinese greatly simplified in manner but immensely forceful because of the passionate nature of the writer. He cared little for what may be technically called "purity of language," and he boldly made use of any material, terminology or phraseology that might enhance the effect of his writings. In this way Mr. Liang succeeded in applying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o a wider and more varied use than it had ever been applied by the great writers of the past. His writings were read by the youths of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no one of my generation who can read has been able to escape his influence. He has popularized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s no one else before him had ever done.

But Mr. Liang was a great popularizer who spoiled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ithout creating a style which would be truly popular and at the same time full of literary possibilities. His own catholic interest and wide sympathy and above all his own passionate personality have made his writings exceedingly readable and even thrilling. But when this instrument was put into the hands of his juvenile imitators, all the shortcomings soon became manifest: simplicity became vulgarity and passionate emphasis became redundancy and mannerism. Even Mr. Liang himself began to shun his own style in his later works. The younger publicists, notably Mr. Chang Shih-chao (章士钊) and his followers, sought to

create a new style by introducing from the European languages the elements of syntactical complexity and logical precision. They hoped to make the classical language more logical and exact in order that it may become a more effective vehicle for the abstract and complex ideas of the modern world.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y succeeded fairly well in producing a highly polished and exact style, and history will probably say that the classical language has rarely attained such a degree of flexibility and precision as the expository and argumentative prose produced by these publicists.

### **The People Still to Reach.**

Such, then, were some of the heroic attempts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during its last days of power. A language which had outlived its usefulness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was summoned to discharge the new duties of translation Dickens and Dumas, Darwin and Huxley, and of serving as the instrumentality of publicity and propaganda. The task was difficult and failure was certain. The end was truly tragic as the efforts were truly heroic. The painstaking translations of Yen Fu and Lin Shu and the polished prose of Chang Shih-chao and his school have met the same fate: *they could not reach the peopl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this situation became so apparent that Mr. Huang Yuan-yung (黄远庸) one of the best prose writers of the day, wrote in 1915 to his friend Chang Shih-chao these repentant words:

“In my humble opinion, politics is in such confusion that I am at a loss to know what to talk about. Ideal schemes will have to be burie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unearth. As to means for a fundamental salvation, I believe the beginning must be sought in the promotion of a new literature. In short, we must endeavour to bring Chinese thought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ought of the world, thereby to accelerate its radical awakening. And 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 basic ideals of the modern world must relate themselves to the life of the average man. The method seems to consist in using simple and simplified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or wide dissemination of ideas among the people. Have we not seen that historians regard the reviv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overthrow of mediaevalism in Europe?”

This letter, the significance of which was ignored even by its recipient, sounded a new note at a time when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lass was centered on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country. It re-opened a problem which had been forgotten partl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the age and partly because of the seeming success of the new prose style of Mr. Liang Chi-chao and his successors which had appeared to many as having at least partially solved the language problem. The Chinese public was then too deeply occupied with the monarchist movement of Yuan Shih-kai and the 21 demands of Japan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Mr. Huang's proposal. But abou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above-quoted letter was written, a few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were carrying on a serious controversy on 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ne party to the controversy held that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as dead or at least half dead and therefor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being the medium of a living literature. The future literature of China, whether in verse or in prose, must be written in the *peihua*, the living language now spoken by the people. The *peihua*, is the language in which all the great and popular novels of the last five centuries were composed and is therefore full of promise as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the future. In the course of discussio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poken tongue as a medium of writing popular novels was admitted even by the conservative defenders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but they still contended that the vulgar speech of the people was not fit to be employed in poetry and polished prose. To prove to my friends that poetry could be written in the living language of the people, I made a resolution in 1916 never to write any verse except in the *peihua*. And I called my new poems “experiments in poetry.”

### Some Suggestions for Reform.

So the controversy went on for some time in America an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year 1917 was published my article on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which I said that literature changes with time, that every age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literature, and tha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great novels written in the *peihua* must be regarded as the only great masterpieces during the last ten centuries and the *peihua* will undoubtedly be employed as the effective tool for all literary composition in the future. In February of the same year my friend Mr. Chen Tu-shiu (陈独秀) published his article on "A Revolution in Literature" which was a sympathetic response to my first article. In my second article entitled "The Historical View of Literature," I again pointed out that as the ancients had produced their literature, it was our own turn to create the new literature of our age; and that the *peihua* literature since the time of Sung and Yuan which, though rejected and despised by the literati, had grown both in bulk and in intrinsic quality, was sufficient to indicate to us the tendency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pril, 1918, I published my article on "A Constructive Revolution in Literature," which was summed up in the sentence: "Produce literature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you shall have a national language of literary worth." The historical examples of Italy, France and England were quoted to show that it was quite possible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language by producing sufficient amount of literature of vitality and intrinsic beauty. By this time the informal discussions of a few college students in America had developed into a formidable programme of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headquarters of which was established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where Mr. Chen Tu-shiu and I were professors. The friends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had by this time all resolved to write only in the *peihua*, and our magazine "The New Youth" (新青年) published many of the early poetic experiments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 Opposition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a little over two years the cause of literary revolution had attracted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nvite strong opposition from conservative quarters. Mr. Lin Shu who had made his reputation and his living through his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novels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as the leader of opposition. He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the Chancellor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asking him to expel the professors whom he accused for having corrupted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by their advocacy of the language of the ricksha coolie and bean-curd seller. There was a movement to appeal to the Government and Parliament for drastic measures against the University. Opposition grew so strong that Mr. Chen Tu-shiu thought it wise to resign from the deanship of the College of Letters in order to save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violent attacks of its enemies.

But opposition is only a form of public attention and it often gives to an unpopular cause more free advertising than it can otherwise hope to obtain. The heroic efforts of Mr. Lin Shu and his friends have succeeded in bringing to the cause of literary revolution many new supporters. Then a political accident which took place on the fourth of May, 1919, suddenly made the University exceedingly popular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 that memorable day, the students of Peking made a public demonstration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the Paris Conference regarding the Shantung question, and ended in burning down the residence of one pro-Japanese Minister and beating another almost to death. The youth of the whole country arose in sympathetic support of the action of the Peking students and the memorable "May Fourt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so-called Student Movement which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is still causing no small amount of trouble to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o politicians. Whatever be the judgment which history may pronounce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students of those year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student movements have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the same

mysterious manner as they have incidentally brought abou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Yuan Shih-kai dollar by foreign banks in Shanghai as on the same footing with the Mexican dollar. The more enlightened political parties saw the change of the tide and soon converted their party organs into propaganda for the *peihua* movement and for the “new thought” and “new culture.” The conservative magazines threw open their columns to *peihua* contributions and the big publishing houses began to publish book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Since 1919,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has spread with a rapidity far exceeding the wildest expectations of its early advocates. In 192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an order that, beginning with the autumn of that year, the text books in the primary schools should all be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is order was probably meant to be a compromise measure aiming to confine the use of the spoken tongue in the primary schools. Bu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s so organic that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lowest grade will of necessity effect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the higher grades. Consequently the *peihua* has now invaded all schools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to the university.

#### Literary Experiments.

More interesting still are the numerous literary experiments that are being made by the various groups of young writers both in poetry and in prose. In the few years since the first declaration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there has been produced a *peihua* literature sufficiently bulky to give to its original sponsors as much amazement as good cheer. Behind all seeming confusion and anarchy in the literary world to-day, a few clear tendencies of great promise may easily be discerne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eihua*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the only effective medium for all expository and descriptive prose, and there have arisen a number of young writers who are creating a prose style of clearness and force. Experiments are also being made in the direction of producing prose essays of a familiar and humorous style, an experiment which was impossible with the

dead classical language. In the second place, serious attempts are being made in the field of the short story. The stories by “Lu Hsun” (鲁迅) the *nom de plume* of an author who prefers to conceal his real name, and of Mr. Yo Ta-fu (郁达夫) have led us to hope for a great future in this field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third place,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poets are bringing out a formidable quantity of new poetry of which, though much is worthless, much is of fresh vigour and lyric beauty. The poetic genius of the nation has been too long suffering under the shackles of formalism and technicality and above all the limitations of a lifeless language. Once these fetters are thrown off,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rushing to poetry to give expression to its sufferings and lyric feelings. When the new poetic medium is better mastered, we can safely look forward for a plenteous harvest in the field of *peihua* poetry.

Bright as the future of the new literature of China may appear, the greatest success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s seen in its effect upon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Hardly four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national language was first used in the text books of the primary schools, and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this change has already told abundantly upon the millions of young school children in the country. Instead of reading things which had to be translated before the meaning could be grasped, they are now reading fairy tales and child storie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they readily understand as soon as the words are pronounced. I have seen children of five years old reading illustrated fairy tales with keen interest and apparent joy,—a sight which certainly gladdens my heart and leads one to think that, even if nothing else should result from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ne would still have the great consolation that it has at least made the school life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easier and more enjoyable than that of their fathers had been.

#### The Solution.

Thus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at last found its solution. The key to the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has been found in the frank

recognition that the classical language has been dead for two thousand years and that its place must now be taken by the *peihua* which is spoken with only slight dialectic variations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except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s and in which were written all the most popular novels that have already for hundreds of years become the great teacher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hom the arrogant literati considered as illiterate.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many reformers have proposed schemes of *peihua* magazines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and phonetic alphabets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 All these have failed for one and the same reason, namely that these reformers have propos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sses that which they openly reject for themselves. They thought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as good enough for themselves and they only condescended to favour the *peihua* or the simplified characters for the lower class of illiterates. It was natural that they could not arouse sufficient enthusiasm for the

schemes they proposed. Herein lies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early proposals and the recent advocacy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latter made no class distinction in their proposals: what is good for the millions of people is good enough for us who call ourselves men of letters. We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have a national language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and the illiterate, it must be first raised to the dignity of a literary language. When it is recognized as the legitimate medium for literary composition, when poets and essayists as well as popular novelists are no longer ashamed of producing their masterpieces in it, then,--and not until then,--it will follow as night follows day that it will be used as the proper instrument for public education.

(席云舒供稿)

## 胡适 1924 年英文佚文《从死的文言到活的口语》

沈雅婷

在席云舒先生搜集到的胡适英文佚文中，有一篇发表在 1924 年 7 月 14 日 *North-China Daily News Sixtieth Anniversary*（《字林西报》的六十周年刊）上的题为 *From the Dead Language of China to A New and Living* 的英文文章，题目可译为《从死的文言到活的口语》。由于此文并没有被《胡适全集》、《胡适英文文存》等作品集收录，且各种胡适年谱中也没有记录，因而可视为一篇佚文。此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缘由，是胡适早期有关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一篇较长也较为重要的英文文章。由于此文的内容与 1922 年胡适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有诸多重合之处，故可放在一起比较。

胡适这篇英文佚文以时间为脉络系统地论述

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内容涉及古文在最后时期所做的贡献和必然走向末路的历史命运，以及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和白话文的功绩，并分析了历史上文学革命失败的原因。文章开篇首先提出文言曾因作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被保留下来，任何希望谋求官职和政治地位的人，都不会质疑这一手段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也不会质疑文言的地位。正文分七个部分：第一、二部分介绍欧洲列强的入侵使得民族危机加剧，古文勉励改革以求应对这场危机。西方各国的军事和思想方面的传入使得中国的文人志士们意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严复和林纾致力于通过翻译西方文学、哲学乃至科学著作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梁启超也用自己创造的“新文体”来发表政论文章；第三部分总结古文因难以承担历史任务，且“不能

与一般之人生做出交涉”，势必要退出历史舞台，而白话才是未来语言的希望；第四部分是胡适对自己“有意的主张”，即对在文学革命中所提建议的提炼，涉及《历史的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观点；第五部分介绍文学革命虽遭到林纾等保守派的反对，却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并借由五四运动得以快速传播；第六部分概述了在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方面进行的文学实验，并指出文学革命的最大成功在于它对教育的影响；第七部分阐明了历史上倡导白话报、官话字母的主张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倡导者仍保留着士大夫的传统心理，认为白话只是给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百姓看的，而文人自己仍应做古文的阶级观念，并总结要解决白话取代文言的问题，首要是承认文言已死，并提升白话的地位。这篇文章观点鲜明地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坦白的承认古文是已经死了两千年的语言，而它势必被白话所取代。”这正是胡适“有意的主张”：废除文言，提升白话的地位，通过建立“国语的文学”来提升白话文的文法。

这篇英文文章诸多观点大都可以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找到出处，可以说是对该文的提炼和概括。例如，胡适在文章中既对严复、梁启超等人在古文最后岁月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肯定，但又明确指出古文的局限性的观点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相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已经提到“古文学的末期，受了时代的逼迫，也不能不翻个新花样了，这五十年的下半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也是“古文勉求应用的阶段”。并将这段古文学的变化史分为严复、梁启超的翻译文章，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文章，章炳麟的述学文章，章士钊一派的政论文章四部分，称之为“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认为他们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功夫，没有做到“与一般之人生做出交涉”，不知道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此外，胡适在对历史上的文学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阐释时，也延续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观点，即晚清的白话文倡导者们仍局

限于将白话和文言进行分层，认为白话只是下里巴人所用的语言。其实胡适1916年留美时期，在与梅光迪论辩究竟是应该普及白话文，还是应该提高文学的水平问题上，就曾提出过“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讲得更为全面：“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在地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级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自己仍旧努力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

虽然两篇文章大体相似，但还是有些许区别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论述从1872年到1922年间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开篇从桐城派古文中中兴时期为开端来谈古文的末运史，而From the Dead Language of China to A New and Living则首先论述了文言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失去生命力，但却因为科举制度而被保留下来。这是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没有未提到的。科举制度是延续文言这种“死文学”的原因的观点，胡适于1925年9月29日在武昌大学演讲《新文学运动之意义》时再次加以阐述。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论及白话文功绩时，虽也论及对教育的影响，但只涉及北洋政府教育部对国文教科书的改革和注音字母的统一。而在这篇英文文章中，胡适特别从全国数以万计的小学生身上看待教科书改革四年来的成果，他们读的是童话故事而非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懂得的古文，并且指出文学革命对教育的作用是相当基础和重要的，认为即使文学革命达不到其他的功绩，使孩童们能接受比他们祖辈更加愉悦和轻松

的教育，也是很令人宽慰的。这与1925年的《新文学运动之意义》中，胡适指出“教育是白话文学之最低限度的用途”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其他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在论述白话短篇小说的成就时，除鲁迅外，还特别提到了郁达夫，肯定了其作品在白话小说中的地位，胡适在其他论著中很少提到郁达夫的创作。

虽然这篇英文佚文中的观点在胡适的其他中文著作中也多有论述，但此文精炼地概括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进程，对于研究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仍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 《胡适口述自传》

(征求意见稿)

胡适口述 唐德刚整理 张书克重译

### 第十六章 孤身一人写白话诗；文学革命的宣言

1916年11月，我总结这一年来的争论，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准备交国内的杂志发表。<sup>1</sup>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八项温和的建议。而且，你能看出，题目本身就很温和。我曾经在少数密友中呼唤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经常出现在我的诗中或者致朋友的信中；结果，朋友们写给我的信中也经常使用这一词汇（他们有时候一本正经，有时候则出于嘲讽）。现在，我不再呼唤着发起一场文学革命。现在，我第一次将一年来的讨论过程和我自己的结论公之于中国国内时，毫无疑问，我面临的是老一辈极其保守的批评者；我觉得，我的态度应该更加谦逊。因而，我将这篇文章定名为《文学改良刍议》。意思是：这是改良，不是革命；这只是刍议，还不是结论。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八项改良建议：

一、须言之有物。也就是说，作者首先要有话要说；要强调文章的内容，而不是文章的形式。

二、不模仿古人。我在此项之下加入了我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后来，我称之为“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这一观念的要点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文学，后来的时代不应该模仿此前的时代。我还强调了历史上白话文学的重要性。这些白话文学出现于13、14世纪之后，其形式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等等。

三、须讲求文法。这一点听起来似乎很荒唐。不过，我们这些对中古世纪中国文学比较熟悉的人就会意识到，这些文学作品中有很多都不合语法。汉语语法其实很简单；可是那些古代作家喜欢使用一些文学的技巧故意把语法弄得很复杂。他们惯用的伎俩有：四六骈偶体、大量使用历史典故等等。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作家写文学作品时很少考虑到语法问题和句子结构。

四、不作无病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用典是中国文学自中古时期开始流行的一种花样。先秦时代的人们还没有这种恶习。从中古时代开始直到近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诗文都在内）充满了历史典故。在这篇文章中我用了很长的一节来谈论这一问题；这是因为，近2000年来，中国文人已经习惯于使用文学典故和历史典故这一糟糕的文学传统，我“不用典”的提议未免太过激烈。

七、不讲求对仗。<sup>2</sup>这一点也很难用英语解释。不过，对仗在中国诗文中极为普遍。

八、不避俗语俗字。<sup>3</sup>这是最为重要的一项。不过我的提法仍然很温和委婉。我想说的是：“使用活语言——使用俗语——使用白话；任何文学形式都应该如此。”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我公开宣称，我认为，《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伟大的小

说，以及当代那些流行小说（我在文章中列出了这些小说作者的名字），它们比古典作家的复古作品更能代表时代的精神。我坦率承认，白话写成的长篇小说、戏曲以及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被历代文人鄙弃，却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这些作品才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它们的出现，要归功于俗字俗语这一文学工具的有效性。

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写成于1916年11月。当时我有三份稿件。我把一份送交《留美学生季报》发表（当时我是该刊的主编；该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另一份我寄给《新青年》月刊。《新青年》创刊于几年前，由陈独秀主编。陈氏于1916年受聘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

这篇文章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后，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两位北大教授对该文甚感兴趣。一位是陈独秀；另外一位是钱玄同教授，该校的古文字学专家。钱氏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章炳麟）的学生。他能对一个留学生写的讨论文学改良的文章甚感兴趣很让我吃惊。钱先生后来告诉我，他曾经和陈独秀先生讨论过我的建议的重要性。陈先生本来就是一个“老革命党人”，写了一篇呼应我的文章——《文学革命论》，发表在《新青年》下一期上。他公开呼吁中国文学革命。陈氏并且坦承，文学革命的呼声最早是由其友胡适发出的，他现在只不过是打出旗子来声援朋友；革命的大旗上应该用大字写上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氏提出的这三大主义表明，他的想法和我对中国文学史的理解非常接近。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他并且找出了很多革命的事迹。当他叙述到近代阶段时，把阻挠从宋元以来就开始的文学革命（宋元时期，开始使用白话来创作长篇小说和戏曲）的复古文学代表人物统称为“十八妖魔”。那时候，我们的历史研究还没有弄清楚《水浒传》等伟大著作的真实创作年代。我们还以为它们是

元代的作品。现在我们了解的多一点了。那些伟大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经过几个世纪的流传；有些长篇小说直到明代才形成最后完美定稿。不过在那时候，陈独秀先生和我们都认为，元代达到鼎盛的文学革命浪潮，是被明清时期的“十八妖魔”给打断的。

“十八妖魔”是哪些人呢？他们包括：明代的前七子、后七子；古文四大家（包括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方苞、刘大魁、姚鼐）。古文四大家中，后面三位都出自我和陈独秀先生的故乡安徽省。安徽现在又出了一个陈独秀，竟然把他的三位同乡也归入了“十八妖魔”之列。陈氏鄙弃中古时代直至近代的复古文学，却大力赞扬说书人、戏曲作者及小说家们所创造的通俗文学。

钱玄同教授没有写文章。不过《新青年》杂志刊出了他写给我和陈独秀的一封谈论学术问题的长信。该信对我和陈氏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批评。像钱玄同先生这样的古典学者，竟然也对我们的观点持有同情的态度，实在是对我们的事业颇有帮助。

1917年1、2月份，在我归国前几个月，文学革命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讨论话题；我和陈独秀先生的两篇文章也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论。许多信件涌入了陈先生的编辑部；其中不少信件由《新青年》杂志刊载。与此同时，我给《新青年》寄去了我最早尝试写出的白话诗；它们也由《新青年》登了出来。今日看来，它们还没有完全从旧体诗中解放出来。正如我的朋友赵元任经常说的那样，我的白话诗文都算不上完全的白话；白话还不够白，还算不上是人们通常使用的口语。我十分愿意接受这种批评。我自己的说法是：就像裹了几十年小脚的中国妇女那样，尽管她不再裹脚，也很难恢复原状。我们这些受过古典诗文训练的人，很难在使用活的语言进行创作时达到完美的状态，就像裹过脚的老妇人，永远也达不到一个天足女孩的状态。

不过我这些早期的诗文竟然也轰动一时；它们和陈独秀、钱玄同的文章、通信一起，被人们传颂。陈独秀给保守派古文大家们起了一个“十

八妖魔”的恶名；钱玄同创造了两个同样有名的句子：“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桐城是安徽的一个县；“十八妖魔”中，有三位出自桐城，他们是：方苞、刘大魁、姚鼐。他们被称为“桐城派”。因而钱玄同称这一派古文家为“桐城谬种”。至于“选学妖孽”，则指的是“文选”。“文选”是中古诗文的选集，由梁代昭明太子于公元6世纪初期编成。《文选》选文的标准当然是中古世纪的。因

而钱玄同发明了“选学妖孽”这一说法。“十八妖魔”、“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说法逐渐流传开来，为文学革命树立了攻击的目标。

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留美学生季报》和《新青年》杂志上都曾经发表过。见下文。

2 《文学改良刍议》原文为“不讲对仗”。

3 《文学改良刍议》原文中目录部分为“不避俗字俗语”。

## 1955年上海市高教界批判胡适的相关情况

朱洪涛

随着胡适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史料的披露与出版，使得在胡适批判这一问题上，逐渐获得愈来愈全面的认识。譬如相继面世的《顾颉刚日记》《邓之诚文史札记》《宋云彬日记》<sup>1</sup>，展现了身在批判氛围中的文化人的各色行径与心态。这些史料披露的好处便是胡适批判的细节愈发具体和细腻，批判过程也得以立面的呈现。然而也有些遗憾，即这些文化人都是局中人，所写所记多数为一己之观感与思考，有的记载甚至是耳食之言，不免错误之嫌。相关记录虽然鲜活然而零碎，不见大体的呈现。这并非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因为胡适批判涉及三方：官方、胡适、文化人。在这三方之中，胡适的视角基本是不重要的，即不管胡适愿意与否，这场运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胡适对这场运动的观感与评价在相关资料中已有记载。文化人的应对则随着越来越多私人日记书信等材料的涌现，亦不鲜见。唯独官方的批胡意见较少看到，特别是地方当局，更是少见。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看到一些与胡适批判相关的政府文件，或可补以往研究胡适批判官方视角之缺憾。

这些史料主要是由上海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

传部下达给上海各高校党委，指导高校如何执行胡适批判的文件。仔细阅读这些材料发现宣传部门对于胡适批判的流程有清晰的规定与要求。从批判目的讲，在一份“上海各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计划要点（初稿）”<sup>2</sup>的文件里强调上海这座城市曾经“资本主义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城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存在和发展有其温床，因而在上海高等学校中开展这一斗争就具有迫切性”。因此批判胡适的目的按照官方的意思归纳为三点：第一，认识全面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意义、方针、政策、及其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第二，认识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所表现的主要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及其思想根源。第三，认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论的反动本质及其对学术各部门的危害。<sup>3</sup>与此目的相对应便是三个步骤的学习阶段，第一阶段为1955年1月10日至1月31日，以第一个具体要求为中心，组织一次至二次的小组讨论；第二阶段为1955年2月1日至2月28日，以第二个具体要求为中心，组织一次小组讨论；第三个阶段为1955年3月1日至4月15日，以第三个具体要求为中心，配合听取学校学习联共党史第四章哲学部分的报告，组织二次至三次的小组讨论。具体时间安排为每周周一至周四的上午八时至九

\* 此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文化语境中的顾颉刚研究（1917—1937）”（17ZWC002）阶段性成果。

时，讨论时间则临时另定。学习的文件包括郭沫若、周扬、李希凡、何其芳、王若水等人文章。具体的学习方法，“初稿”指示为四种：第一，讲演会。强调这种形式的批判须切实贯彻“自愿听讲”的原则，每月一到两次，每次二小时半为宜，题目范围不要过大，文件说“目前高校党委举办的全市性的启蒙讲演，各校应组织进行传达”。正式文件中少有的出现了“启蒙”二字。第二，专题座谈会。主要目的是思想酝酿，领会政策，提高对运动的认识。文件规定这样的座谈一般要以系为单位进行为好。会前须围绕一定的具体目标组织发言，可以开展必要的讨论。但也强调这样的会议不宜过多，过多容易使教师“疲塌”。第三，论文讨论。这种专题批判论文主要是为展开不同论点的论争，文件对此种形式的批判做出了具体要求，“系与教研组对此应有全面计划，但注意选题不要太多，并提倡教师集体撰写”，并谓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给以较长的准备时间和必要的资料，经过充分的研究之后再提出。讨论发言也必须很好组织，保证讨论在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学术水平上进行，防止形成对文章文字细节的讨论或对论文撰写人的批判。这是使批判深入开展的主要形式”。文件在强调批判的同时多少还顾及了学术含量的保证。第四，写文章和读文章。这两种形式可以穿插进行，但必须加强领导，务使“普遍、有效”。文件指出在斗争中应密切注意教师的思想动态，特别是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或学术上有影响力人物的思想动态，“及时进行解释和教育”。还说在批判过程中，注意不要因此再增加教师在时间上的负担，以免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时，在批判中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鼓励其学习钻研，“发言力求具体分析，有内容，以理服人，防止生硬批判、与老教师对立的现象与情绪的发生”。文件提出注意批判的方式，强调有理有据，尊重老教师的态度，从实际的批判历史回看，就以顾颉刚日记为例，他所记载上海高校界的胡适批判让其心力交瘁，疲于应付<sup>4</sup>。尊重老教师这一点在后来的批

判中实际是很少顾及了。

笔者在阅览这些文件时，发现除了上述对批判时间、批判方式的相关表述外，还有对各高校开展批判的反馈与意见。这些意见涉及了具体的人物，显得特别鲜活而生动，是历史细部的细腻补充。

在“上海各高等学校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批判的情况简报 第一号”<sup>5</sup>文件中将各高校批判情况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开展较好。如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评为较好是认定这些学校在运动中阐明了党的政策，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还联系了教学实际，检查了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论调。第二类是只在党内做初步酝酿，布置了党内干部学习，但如何在党内外进一步加强贯彻、开展，相关高校党委尚未有肯定意见。文件点名批判上海第二医学院，认为该校在教学中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指出教师中普遍存有愿意作研究工作，不愿作教学医疗工作的倾向，如教师中有人说“研究工作是收入，教学工作是支出”、“研究是天才，教学是人才，医疗是地才”之类的话语。第三类是党内外基本上没有动起来的学校。这类学校有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客观原因也是这类理工类、实用性学校与批判俞平伯之间二者关系不大。“初稿”对某些高校批判效果不明显不满意有这样一段表述：“斗争的开展仍不够有力。少数学校领导上对于这一斗争尚未提起严重注意，至今尚未认真贯彻；有些已开展起来的学校由于思想领导不够深入，理论队伍比较薄弱，批评与自我批评尚未展开，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就不能获得及时解决，讨论就不能保证在一定的思想水平与学术水平上进行。”

如果把“初稿”与“简报第一号”对读，实际存在的问题在“简报第一号”中表述得相当具体。文件认为上海各大高校大部分没有动起来，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不够深入有力，不仅在批判深度上没有超过李希凡、

蓝翎所揭发的范围，且对俞平伯的观点尚没有从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特别是还有一部分教授思想上还存有顾虑”。文件把这些问题总结为三大表现、四大原因。

第一种表现为政策认识不清，思想有顾虑。并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仲苏和施蛰存为例。黄仲苏认为：“党领导这次运动是有方向有政策的，对俞平伯的批判是射人射马（意思即表面上好像射俞，实际上是射我们），对胡适的批判是擒贼擒王（意思即是先打倒胡适，我们就可举手投降了。”施蛰存放话说有学生代表参加批判会，他就不参加了。是因为他受到在解放日报社召开会议，学生向老师面对面提意见的影响，故有此语。施蛰存在会上说“搞的乱了，把俞三十年前的《红楼梦辨》也提出来了。”师大校长孟宪承对批判表现“很消沉”，原因是他对杜威很崇拜，他曾对助教说：“杜威是有学问的，还不错，去苏联参观时，他说他的教育原则在苏联真正得到了实现，当时苏联也很尊重他。后来所以批判他是因为他有托匪嫌疑。”正因为孟宪承有这些思想，当解放日报记者约他写教育方面的批判文章时，孟宪承借口学习俄文太忙而拒绝。另外，有的教师对俞平伯抱有“很大同情”，有的教师说批判俞平伯是“打落水狗”，还有一些教师说胡适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知识，这样批判无形中提高胡适的知名度，“向来我就瞧不起他，现在却从各方面系统地批判他，这样岂不是更加提高了他的身价？”这与史学家邓之诚的看法不谋而合：“此间科学院开会，分九方面讨论胡适思想，甚为热烈。讨论或将到明夏始毕，书生千古未有之荣，胡适将自夸矣！”<sup>6</sup>

第二种表现是对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缺乏深刻认识与批判，文件批评讨论会上有的教师发言“庸俗空洞”、“甚至有错误观点”。譬如华东师大徐震谔教授散发这样的“错误观点”：“贾林反封建的精神由于娇生惯养的结果，贾宝玉是掌上明珠，林黛玉是独生女，所以不能忍受旧家庭的束缚。”

第三种表现是缺乏具体分析，基本观点掌握不准。指出有的教师把贾、林捧为反封建的英雄人物。如师大教授、翻译家罗玉君认为林黛玉是“中国最优秀的悲剧典型”。

在另一份文件“上海各高等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情况简报 第二号”<sup>7</sup>中对问题的表述则是以学校来区分的。文件提到复旦大学在批判中部分老师有思想障碍，不利于批判的进行。教务长苏步青反映，“现在理科教师一般采取‘隔岸观虎斗’的态度，站在运动之外”。副教务长周予同提出，“不要采取过去思想改造运动的方式”，“怕风刮到自己头上”。在1955年3月9日举行的批判胡适文学思想的会上，华东师大的徐中玉教授虽然批判了胡适，但文件指明他没有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的高度进行批判。罗玉君教授虽然认为胡适是“欺世盗名的投机者”，但也没有很好的具体分析。还有的教师做的报告演讲没有抓住观众，演讲内容“不够精练”，引证胡适原文太多，讲演时间太长等等问题在文件都有记载。

之所以产生不深入不广泛的现象，文件归纳了四个方面原因。第一，领导对开展工作的要求、步骤、方法指示不够明确，使各校很难具体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二，“干部缺乏‘本钱’”，缺乏领导学术讨论的经验，因之工作上被动、不大胆。有的干部说，“学术讨论是硬碰硬，真枪真刀，自己一无本钱，二无经验，不敢上战场。”第三，上海市高校开展批判缺乏党的统一领导、通盘计划。第四，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对这一工作缺乏重视，而且党内外缺乏批判的武器，“有党内干部缺乏学术知识，缺乏领导学术讨论的经验，因而不敢大胆深入战斗（如有的党员院长把胡适之与胡愈之混为一谈）。”

诚如文件所言，上海这座城市曾是“资产阶级”思想相当浓重之地，经济、文化也相当之发达，因此清理资产阶级思想也显得繁难。对于在中心城市上海的各大高校开展胡适批判运动，无疑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这种典型意义体现在批

判方式、批判效果、教员思想动态等方面情况的汇总，对于其他局部地区的开展运动具有借鉴作用。而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这批文件，恰好为我们认识当年的胡适批判运动提供了新角度。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1 笔者此处使用的《宋云彬日记》为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版本。

2 落款时间为1955年5月11日，以下简称“初稿”。

3 见《上海高校、中技党委关于上海各高等学校对胡适派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的计划情况简报》，该文件右下角钤有“沪委学收字 00303 号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字样。

4 请参看笔者的《“胡适批判”中的顾颉刚》，《读书》，2014年第2期。

5 档号：A23—2—26。该文件首页右下角钤有“沪委学收字 00421 号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字样，署名单位为“中共上海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传部”。以下简称“简报第一号”。

6 1954年12月17日日记。见《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844页。

7 该文件末尾署名单位为“中共上海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传部”，落款日期为“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

## 胡适的几篇散佚文献

肖伊绯整理

### 哲学是什么？——科学的科学

协和每星期五晚上有讲演，前天他们请我去讲演，我答应了。今晚所讲的题目《哲学是什么？》，这比较是抽象的题目，恐怕诸位在书本中已经看过。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柏拉图哲学研究是永久存在的，万古不灭的东西。但是现在哲学快要破产了，因为昔时哲学家的问题，现在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去找哲学家，偏要去找天文家、地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智识论是讨论智识的方法，本为哲学的范围，现在也变为科学范围了。哲学范围一天比一天小，我这哲学教授的饭碗，恐怕也快要打破了。(全场哄笑)但人生观的问题，是在哲学范围内的，现在为饭碗计，当然是要必须保存哲学的，科学能见分析品，不能见天地之大，所以哲学是科学的科学，依我让步的观点看来，哲学是研究人生观，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而目的在求得一个普遍的实用的意义，注意下列各点：(一)哲学范围缩小了，只研究人生观、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二)什么叫作意义，意义有三：(甲)意义从那儿来，就是原因，(乙)怎样变成意义，(丙)有什么结果。思想起原至少有两条路，如北京大学到协和礼堂，向东走还是向西走，走的好，还是不走的好，有了这二个思

想，便成了哲学问题。哲学不是今天往东走，明天往西走，在某条件中，无论何人，一定如此走，哲学是经过思想的。凡各事都是这样解决，就是求得一普遍适用的意思。昨天《大公报》登了《贼留说帖何苦求情》的新闻，贼偷了六百元钞票，留下字条，说家人饥寒已死，不得已而为之。这个“不得已而为之”就是哲学上的“必然”。哲学是要想到普遍适用的意义，求得真理。如果科学家把哲学的问题解决了，宁愿哲学宣告破产，不要同人家去争。言毕，全场鼓掌而散云。(《京报》，1930年10月19日)

### 胡适之讲《中国传记文学》

#### 【传记文学资料当求之于历史】

所谓传记文学，系某人之事，由其长辈同学或小辈撰而为文，以资流传。今人提倡“传记教”，即欲补救人格教育之缺乏。此种资料，不能在抽象名词中求之，如孝悌忠信等。亦不能在教科书中求之。而实常常于历史中择死而实不死之人格以为模范。中国历史中实少此种传记，若西人之崇信基督教者，以《圣经》为其模范。而非教徒亦自能有其崇信。昔波塔特氏曾著有《亚力山大及凯撒合传》，其注重点均在二人之人生，叙述灵

魂所显示之精神，较诸记述争城夺池之事，实胜一筹也。反观中国，此种传记文学实付阙如。

### 【传记文学影响于人生者颇巨】

须知传记文学影响人生颇巨。胡氏演说至此，并举二例以明之。继又勉人寻求作传记文学（研究）之新途径，谓今人之从事考据事业，应放弃以古代事物为目标此种考据，除难得证明或否证，且徒将时间荒废，实属不值。胡氏继又将中国传记文学大概分为两大类，详加解释。

### 【传记文学第一种为他人所作】

传记文学第一种，为他人所作传记。此项又可分为——1，小传——多为友人所作，于该人之事迹，夹述该人之风趣事。此种文多简短，实不能予以全部概念。2，墓志铭——此类多刻于墓石，文简意少，更无文学价值。3，碑——文字可长，亦刻石上，惟多谄媚之词，亦少价值。4，史传——凡人物志、县志皆为当取材于人传记中。5，行状——某人去世，家人常延人代撰行状，以为史馆修史作墓志之用，故文字自可甚长。此为传记最早稿本，未经后世文人之胡乱点窜，故多佳作。欧阳、东坡二人文集中，多此类作品。6，言行录——此类或为生徒对其师尊，或为子孙对其亲长平日所记载之言行，自《论语》始，此类佳作甚多。7，年谱——某人去世，将其一生重要事迹分年排列，谓之年谱。宋人即有编唐人年谱者。此本为传记之草稿，其后中国甚为发达。8，专传——此类作品，古即少见。有玄奘法师弟子所著玄奘法师传。近有张季直先生传记。

### 【传记文学第二种为本人所作】

第二种为本人所作传记。此项又可分为——1，自叙——此类文皆不长，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论衡·王充自记》。又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亦变相之自叙传。2，自传——过去生活之追述，包括旅行、赋诗作文等。3，游记——作者之游历记载。4，日记——私人往来信札，多能记载某人事迹及心情等。6，自编年谱——此为本人自编年谱。胡氏演说至此。已将中国传记文学类别述明。

### 【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之原因】

继又谈及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之原因。略谓第

一系国人多不崇拜英雄。在专制政治之下亦无法收集此种资料。第二，传记多忌讳，此殆为言论不自由所致。第三，文字阻碍。活文字始能记述活生活，而我国一向皆用死文字。第四，系国人一向轻视传记文学。故亦少传记文学专家。胡氏最后希望能有一二有兴趣（者），努力提倡传记文学云云。（《平西报》，1934年2月21日）

### 胡适讲演翻译文学

由利玛窦迄今三百年来，《圣经》展览此尚为第一次，允足称贵，盖仅就收藏兴趣一点言之，对此“天下奇书”之搜罗展览，已足令人心快。惟“圣经与文学”一题，周作人先生曾于十四年前《小说月报》上著论发挥，即详且尽，可以参看。今日只略言其宗教经典之翻译，对于中国之文学影响及本人对于《圣经》之数点希望而已。

在我国历史上大规模之从事翻译外国文字，约有二次：二次皆为受宗教信仰之启发。一为第一至第十世纪之九百年来翻译佛家书籍之努力，成书二千种，现仍为人讽诵者尚有《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二十余种。其影响于中国文学者则（一）介绍国人创作上之新材料、新形式。（二）引起创作家之想像力，扩大文学描写之范围。此皆中国文学篇所缺乏者。第二次则为近世纪来之西洋书籍之大批翻译，而此中最足称述者为《圣经》之翻译。其故亦有二。（一）因翻译《圣经》者之具有宗教的虔诚严肃态度，忠实于翻译，及《圣经》本身之优美，故译本成为一种“直译的模范作品”（Model Literal translation），简明可爱，尤以官话译本《福音》（Gospels）及《旧约》（Old Testament）中的诗篇等部，堪称为优美之文学作品，影响于中国创作家及译著家者甚多。（二）则为中文《圣经》之于中国方言方面的贡献。中国方言甚多，初无有文字之形式记载，有方言《圣经》翻译后，乃给中国多种方言以文学上之价值，对于研究语言学、语音学、民俗学上，有莫大之裨益。

### 三点希望

惟中文之翻译《圣经》，尚有未能如吾人希望

之极者，简言之有三，亦即余对《圣经》翻译之希望：（一）译语尚未全近代化。盖近年中国语言，变化甚速，而《圣经》翻译语尚多守旧者，故仍须继续新译，以合时代。（二）宗教的守旧拘谨精神，致《圣经》尚未采用新式标点、排列、形式，以更发挥其文学的趣味。——Moulton之“近代读本的圣经”则清新可喜——如杂歌、诗篇、箴言、约伯记，皆最美之文学，而未能以新形式体裁表之。（三）将《圣经》作为文学看，注重“科学的圣经学”，提倡收藏、批评、校刊、训诂诸工作，并编著用作参考之辞典类书，以备阅者之方便检阅。果能如此，则影响中国文学，唤起更多读者，必更广大也云云。（《华北日报》，1937年3月18日）

### 中国的国语

（三十七年七月六日在北平福德图书馆

胡适先生讲，张玉堂笔记）

国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的语言。

国语的来源是“方言”，许许多多的方言竞争中特别占优势的一种方言，这种占优势的方言，成了最高的东西，成了大家所了解的话。于是变成了国语。这方言是很光荣的。中国北方的方言，就是国内许多方言中占优势的一种，所以成为中国的国语。

为什么北方的方言，会变成国语，且大家公然承认而不反对？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方言之能变成国语，必须有它成为国语的资格。

第一：这种方言，必须说的多，懂得多，区域广，人口众，流行得广，传播得广。譬如：英国话是英国中部的一种语言，它不但是英国的国语，而且在今日世界中是占了极重要布置的语言。这的确不是简单事。英伦三岛这个小小的地方，算起来也不过中国一省大小，竟有好几种语言，然而英国中部的伦敦，因为是政治的中心、商业的中心，而且附近有“牛津”同“康桥”的两个大学，又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关系，人口都集中在那里，文化也在那里发达，中部的方言，就成了最多人说的话，这自然占就了优势，而成为

英国的国语。法文是以巴黎为中心的语言，也是因为巴黎都会的缘故，中国也不外此例。中国有一大片“关话”地域，假使我们从极东北的哈尔滨走，翻一根线到极西的昆明，中间经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北部、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之一部份，这一大段都是关话区。虽然南北关话，各有语言不同，但都是关话，都是大家听得懂的话。比方“我”字，在这一条线上有W0.0.ngo等音，但不管W0或0或ngo，大家都可以听懂，这就够成为国语的资格了。大家不要笑，我在谈国语，而我说的似乎“南腔北调”，要真正的“南腔北调”那才是真正的中国国语呢！

光有第一个资格还不够，还得有第二个条件。这方言的文学作品，必须比其它的方言多。中国的关话区域里，五百年当中，产生不少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好多好多的东西。尤以《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是纯北京话的作品，自然写这作品的“关话”，就成了大众所了解的东西，成了大家公认的语言了。

中国字在最初我们那些造字的老祖宗们，就没有造“字母”，所以非常难学。但我们要从那些匹夫匹妇、痴男悲女的口中，记下的歌词，记下他们的语言，就很困难了，就发现我们的文字太不够用了。我们那些长袍先生们的“之乎者也”等字，一个也用不着，这怎么办呢？我们只有造字了，比如从前说我们的“们”字，这样简单的字，古时就没法写，遇到这种字，只有头痛，不知怎样写才好。于是有写“懣”字，写“每”字的，“我懣，我每”，麻烦极了。遇到一个“呢”字，则更没有办法了，把“呢”字写成“乐”字，“这”字用“遮”字来代替，这简直苦死了。极其简单的字，反弄得非常麻烦。自白话小说一流行，才确定了“们”字、“呢”字、“这”字，许许多多这一类字的写法，这一类字的语言，就变成大家共同的语言了。

“文学”是把老百姓活的文字，用一个标准形式记载下来，使大家都了解，够得上这个标准的文字或语言，才配做“国语”。基督教的《圣经》，

原是用旧文字写的，自一六一一年用英国中部语言翻译出来以后，旧文字的《圣经》，无形中被推翻。新文字的《圣经》流行起来，而且非常时髦。如果一个人的英语说得好，说得够标准，别人便称他的话为“Biblicial”)带些圣经味的。一种言语，用到文学上去，便会这样流行，以致在六、七世纪产生了英国的莎士比亚，莎翁用最标准的英语，写出了他的许许多多的戏剧小说，把那些最标准的话，变为文学上的语言，自然这语言就成了国语，成了大众的话了。

中国一千多年来老百姓们，匹夫匹妇，痴男怨女们，以及流浪的瞽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遗产，尤其是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给我们留下的是最标准的语言。中国关话区、非关

话区，都已完全懂得了这些语言，所以我来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很容易便成功了。所以我说中国的国语并不是简简单单就成国语的，而是包括了上述两大条件，充分的具备了其成为国语的两种资格。

我国的文字固属难学，但我国的语言，却一点没有疑义的是世界上最容易学习的语言。这是我们祖先们，那些道地的老百姓们，经过了长时期的不流血革命，在语言上淘汰了许多的复杂问题，使我们的语言在文法上极其简化，留下这份好的遗产，他们这不流血革命的成果，是值得宝贵的。我希望大家要承受这份遗产，去创造“国语的文学”。(《北平小报》，1948年7月11日)

## 从实验学校到实验外国语学校 ——以胡适在艺文中学的三次讲演为中心

肖伊绯

### ◎胡适参与创办北京第一所“实验学校”

北京艺文中学乃私立办学性质，由北京大学教授高仁山等人于1925年创办。当时学校分为幼稚园部、小学部和中学部，统称为艺文学校。学校设在中南海东墙外，西长安街甲1号。1949年之后，艺文中学改为北京市二十八中学，上个世纪70年代又与北京六中合并，改称长安中学；2004年又与女一中合并改为一六一中学。如今，艺文学校及中学皆为历史陈迹，并无确址可寻了。

殊不知，90余年前创办的艺文中学，实乃北京地区第一所“实验学校”，推行当时在欧美国家风行的道尔顿制教学模式，令时人耳目一新。当时的艺文中学，是继舒新城(1893—1960)于1922年在上海吴淞中学率先试行道尔顿制教学模式之后的又一所国内新式学校。艺文中学的“实验”性质，在当时的北京地区乃至整个华北教育界，都实属创举，且著名学者胡适也曾参与创办该校，位列该校“发起人”之一，只是这段历名久被湮

没，至今少为人知。

艺文中学创办人、首任校长高仁山(1894—1928)，江苏省江阴县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兼任北平艺文中学校长。他曾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之一，并于1927年出任“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1928年1月15日，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是继李大钊之后被杀害的又一名革命教授。

应当说，高仁山生前与胡适既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更兼北大同事之谊，二人交往还是较为密切的。高仁山创办艺文中学之际，就曾以“发起人”之一的名义邀请胡适出席大会并讲演。二人对国内中等教育实情及未来发展趋势，应当早有观点上的交流与意见上的切磋。就目前存世的史料文献来考察，尚有3通高仁山致胡适的信札，可为旁证。

信札其一虽为残件（仅存末两页），但仍可知高曾向胡谈及“暑期学校公开讲演，题目请先生自拟。如必教我拟，我拟几个如下：一、整理教育史的方法；二、初中课程文言白话的成分；三、我期望中的实验学校”，还有“讲演日期准定本月廿八日午四时至六时。讲演地址在三院大课堂，择定哪一题，还请示知”云云。信札其二为短札，称“适之先生：讲题请早告知，能于日内发表最佳。我还有事同您谭谭，不知何时工夫，亦请告知”。信札其三，仍为短札，写有“适之先生：艺文中学发起人会纪事录二份寄呈，内有先生演说稿，系仁近日追忆，略事写出。其中不无遗漏舛误之处，祈即斧正寄回”，落款为“十四，六，廿三”，可知此信写于1925年6月23日。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通信札共三页，有两张均写于印有“北京艺文中学校用笺”的专用笺纸上；且信札内容均与邀请胡适到校讲演有关。（3通信札，见载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第222—225页，黄山书社，1994）据此可知，早在艺文中学开办之初，胡适确曾到校参会与讲演，与首任校长高仁山颇有交谊。

### ◎1925：胡适在艺文中学发起人会讲演， 强调实验须有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高仁山信中所称“艺文中学发起人会纪事录二份寄呈，内有先生演说稿”，这份记载着胡适演说稿的纪事录是否存世，胡适在这“艺文中学发起人会”上的讲演内容究竟如何，至今尚无从确知。胡适生前出版各类文集、选集及《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中也均未辑录此“演说稿”，《胡适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中亦无任何记载；此事遂成“谜案”。因此，90余年之后的读者与研究者，根本无从知晓此次讲演及会议内容的任何细节。

两三年前，笔者有幸获见一部北平艺文中学校于1926年12月初版的《道尔顿制实施概况》（尚有1931年4月再版本及1933年第三版，内容大同小异，略有增订），书中竟辑录有“艺文中学发起人会”会议议程及胡适讲演记录稿一份，且将

这些内容合辑为一章“办学要旨”，足见其郑重其事。

“办学要旨”一章引语称：“以下要旨是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高仁山先生、胡适之先生、赵述庭先生、查勉仲先生在本校发起人大会席上对于办实验学校所发表的主张。”据此可知，艺文中学发起人会召开时间实为1925年5月31日，由高仁山邀请胡适等三人出席，共计有四人发表演说。

在此，笔者不揣陋简，酌加整理，转录胡适讲演原文如下：

胡适之先生演说：

前几天仁山先生同我说办试验学校的事情，我当时就很赞成，今天叫我来说话，我很惭愧没有学过教育，亦没有办过学校的经验。我是一个研究哲学的人，与实验哲学有关系的事业，当然有认为本家的必要，所以对于创办试验学校，是很赞成的。方才仁山先生已把办学的几个意旨说出来，我以为稍嫌抽象一点，但在办事以前能提出几个重要的纲领亦是可行的。我是一个研究哲学的人，但不愿说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以为实验是好的。但实验并不是无范围、无目的地随意进行，拿教来作例，并不是今天听说蒙台梭利（Montessori）教育好，就试验蒙台梭利，明天听说道尔顿制（Dalton Plan）好，就实行道尔顿制。所以实验并不像阿米巴到什么地方就算什么地方、一种无方向无目的的进行。我们讲到实验，并不是瞎试验，应当先有一个一定的讲划，但实验计划定下之后，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又不是时时可以随便变的，实在应当从试验的结果，时时求适应。总之如果我们要试验，至少须有个假译，至少须有个最低限度。

我们讲到初中的国文，外国语，自然科学，艺术等等，到毕业时，各项功课应当到什么程度？教师供给学生材料，又应当到什么地位？必须先有了最低的限度，进行时才能有一定的范围。如初中的国文，如何能使一个国民站起来说话，坐下作文章及读书，能有乐趣而不感痛苦，能流畅顺适，而不迟滞死板？在说作读三方面，至少亦须使他们能清清楚楚表现自己的意思与观念。至

于讲到最低限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国文能讲到什么程度，应选择什么材料？有人主张文言白话同时加入的，有单独先注重白话，而后再注重文言的。前年我在上海定课程标准的时候，对于白话文言的材料，都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主张。有了最低限度，才有伸缩的范围。近来我见天津某校教诗，逐字逐句的，讲的呆板极了，并且还有每句压韵的地方，注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字样，大家想想，按照办法去教国文，初中三年的工夫，学生能学得多少？又如有人告我某大学教《庄子·天下篇》，逐字逐句，每一段讲得精致细腻极了，但讲了许多时候，还没有讲完。所以有人说笑话，摹仿“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天三夜，还在黄牛。”的笔法说：“今年天下篇，明年天下篇，讲了一两年，还是天下篇！”这样的办法讲是讲的好极了，但是学生自动的读书能力，完全抹杀了！

再看现在中学校的英文程度，坏的不得了。回想我们从华英初阶读起，用了三四年的工夫，居然可以把英文读通。现在用了五六年的工夫，中学英文程度坏到这样地步，真是莫明其妙！我想此中最大的毛病在没有养成儿童自动读书的能力。我信今后如果打破呆板讲解的办法，我们定下最低限度，定下选择材料的范围及方法，多多选择材料，交学生自动的去读，我信将来的效率，要比现在呆板讲解底下的效率要增多一百几十倍！

我今天仅拿国文英文做例子来讲讲，其余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亦应当有自动办法，以谋增加效率。我现在总起来说。试验不是无目的而随波逐流的，必须要有假设；试验进行的时候，不是无计划的冲动、撞东撞西的，必须有一定的范围，至少亦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

上述 1200 余字的讲演内容记录，明确表达了胡适对艺文中学在北京地区首倡“实验学校”之创举的衷心支持及相关建议。在胡适讲演之前，还有校长高仁山对胡适出席会议及讲演的的简略介绍，称：“此次开发起人会，我们认为是极郑重的一件事。事前我们以为在理论上，实际上及行政上都要有一定的主张……所以我请胡适之先生

讲演的题目是《我对于北京第一个试验学校的希望》。我希望适之先生在我们实验之前，给我们一个哲学上的前提，因为无论何种实验都要先有前提，才能向前去试验。”

胡适讲演毕，高仁山亦有简短评述，称：“适之先生讲演毕，主席起言，略谓我们很感谢胡先生来讲演。胡先生提出的假设与最低限度两点，极重要；我们极表赞同。……将来对于教国文的材料，我们当然还要请胡先生来指导。”显然，高、胡二人在中等教育革新的理论层面上，是颇有默契与共识的；未来的“实验学校”之具体运营中，高仍热切希望胡适深度参与。

从高仁山的开场介绍辞与讲演毕之后的短评来看，可知讲演题目及内容，事前都应与胡适有过交流，二人对此次讲演，皆是郑重其事的。这与上个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教育界开始推行所谓“道尔顿制”，还确实属于“新兴的”、“实验的”的情状相符合的。对于这一“新生事物”，高仁山既为中等教育有了理论创想上的革新而倍感欣喜，又深感到推行与实践这一理论模式责任重大，故有延请胡适等教育专家出席发起人会，阐发“办学要旨”，交流办学经验之举。

### ◎道尔顿制与蒙台梭利教育法

所谓“道尔顿制”，乃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流行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又称“契约式教育”，全称道尔顿实验室计划(Dalton laboratory plan)。由美国 H.H. 帕克赫斯特于 1920 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因此得名。在该理念形成初期，它在弥补班级教学制度的不足，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程序教学、个别指导教育等曾发生过影响。道尔顿制是一种彻底的适应个性的教学方法，此法是要废除班级授课制，指导每个学生各自学习不同的教材，以发展其个性。道尔顿制认为，学校要成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室”，学生自己就是“实验者”。让学生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意志，在老师的指导下相对自由地支配学习时间、选择学习科目、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与他人共处的能力。

然而，道尔顿制也有自身的弊端，即过于偏重学习学科知识，过分强调个性差异，忽视了班集体作用以及德育，在推行时往往会形成教学上的放任自流及学生个性上的过于偏激等不良现象。道尔制曾于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一些欧美国家试行，中国的上海、北京、南京、开封等地也进行过相关实验。高仁山创办的艺文中学，正是中国较早试行道尔顿制的著名私立学校之一，也是坚持这一教学模式最久的中国学校之一，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之后被改建为北京市二十八中学方毕。事实上，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道尔顿制本身的弊端及其对中国国情的不适应，国内采用此制者日渐减少，坚持者寥寥无几。

诚如胡适讲演中所提到的那样，“实验并不是无范围、无目的地随意进行，拿教来作例，并不是今天听说蒙台梭利（Montessori）教育好，就试验蒙台梭利，明天听说道尔顿制（Dalton Plan）好，就实行道尔顿制”。在衷心支持中等教育锐意革新、多做“实验”的同时，胡适也非常明确的指出，“实验”不能随波逐流、追随时尚，教学模式的试验种种，都必得有“假设”的前提与实验效果的“最低限度”。

胡适讲演中提到的“蒙台梭利”教育模式，也曾流行一时，在世界教育史上风行的时间还要略早于道尔顿制。蒙台梭利（今译蒙克梭利）教育，是以意大利的女性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教育方法。1909年，蒙台梭利写成了《运用于儿童之家的科学教育方法》一书，1912年这部著作在美国出版，同时，很快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100多个国家引进了蒙台梭利的方法，欧洲、美国还出现了蒙台梭利运动。1913至1915年间，蒙台梭利学校已遍布世界各大洲；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仅美国就有2000多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蒙台梭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幼儿教育的革命。

早在上个世纪初，蒙台梭利教育模式即传入

我国。1914年11月，日本学者今西嘉藏所撰《蒙台梭利教育法》被中国学者但焘（1881—1970）译出，交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此书较为系统的论述了蒙台梭利教育方法原理，迅即在中国教育界引发热议。当时，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1892—1982）曾高度评价蒙台梭利，称“她的努力和功绩，揭开了幼稚教育新篇章，使幼稚教育耳目一新”。是书初版当年，江苏省就成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随之而来的相关著述及研讨会议也层出不穷。1923年，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蒙养园，开办了两个蒙台梭利班（1926年因人事变更而停办）。

上述这些关于蒙台梭利教育模式在中国推行的早期状况，胡适与高仁山应当都有所考察与研究；而高仁山创办的艺文学校，本亦有幼稚园部，在胡适讲演之前高仁山所表述“办学要旨”中，确也有部分与蒙台梭利教育主旨相近的内容。可见，艺文学校有可能在幼稚园部也曾试行过一些蒙台梭利教育模式中的管理及育儿方法，只是没有十分明确的将之提升为幼稚园部办学的主导理念罢了。这样看来，当时的艺文学校之“实验”性质，的确十分浓厚（其幼稚园部可能也属“实验学校”性质），胡适讲演中提到的、当时已然流行的两种教育模式，即蒙台梭利与道尔顿教育模式，均在此落地生根，付诸实验了。

### ◎胡适重提中学国文教育变革

然而，创新是一回事，实施（实验）又是另一回事，无论憧憬多么美好、目标多么远大的新理念、新模式都在历经“实验”，方能确立或废弃。这也是胡适讲演中一再强调的，实验之前必得有“假设”的前提与实验效果的“最低限度”（书中也将此视为讲演重点，下标双圈符号，以示提请注意）。

实际上，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新文化、新思想勃兴，胡适等新派知识分子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引领着社会新风尚，但总体的社会生态及政治环境之恶劣，并不见得能将道尔顿及蒙台梭利等新兴的国际教育理念整

体引进、持续发展。道尔顿模式因艺文中学的坚持,也仅有20余年的存在历程,之后即销声匿迹;而蒙台梭利模式在中国实践还不到十年,即告退出,直至上个世纪末方才重新在中国沿海城市中试行,如今也并不普遍。当然,这些都还是后话。

不难发现,胡适所高度关注并倾力表达的,并不是某种新兴的国际教育理念如何在中国推行的宏观课题,而是更具体而微的课程设置、毕业程度等实操细则——尤其是如何通过实操细则在制度上的确立与强化,在国文教育方面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与突破。说到底,胡适讲演中一再强调的所谓实验之前的“假设”与实验效果的“最低限度”,也就明确的体现在了国文教育模式为何非得变革,如何变革,变革之后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一系列问题上。这是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所一直坚持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思想立场,同样也适用于他对国文教育如何变革及“实验”学校之操办的评判与意见。

在艺文中学讲演之前,胡适至少已有两次有明确记载的以中学国文教育变革为主题的公开讲演。一次是1920年3月,胡适在北京高师附中作了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讲演;另一次是1922年7月,胡适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学的国文教育”的讲演。这两次讲演的内容,在胡适生前就已收入《胡适文存》,因之广为流传,不乏研究者,在此不赘。

这两次讲演内容相近,均讨论了中学国文教学应达到的标准、应设课程、应使用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四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胡适逐一提出解决之道;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均围绕着一个核心前提,也可以说是核心假设,即中等国文教育的最终目标乃是“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即假设中等国文教育所要达到的最低即度的效果是受教育人可以“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胡适称,他这一基本主张,引用自民国元年《中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提出的“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他认为这一细则“现在看去还不觉得有什么大错误”。他据此进一步提出:“人人能用国

语作文、谈话、演说,都能通畅明白,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胡适在艺文中学的讲演,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收入《胡适文存》,至今也鲜为人知,但其核心主旨与前述两次讲演可谓“一脉相承”。胡适讲演中,提到的“如初中的国文,如何能使一个国民站起来说话,坐下作文章及读书,能有乐趣而不感痛苦,能流畅顺适,而不迟滞死板”这一问题,不但是90余年前中等国文教育的核心问题,即便放到90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等语文教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 ◎1931: 胡适在艺文中学的第二次讲演,

#### 研讨阅读兴趣与学习能力

另一方面,胡适在艺文中学发起人大会上的讲演,并未对当时该校贯彻道尔顿模式展开评述,对此也并未有任何具体建议,只是一如既往的对国文教育发表意见,一如既往的慷慨陈辞。

遗憾的是,胡适讲演之后,高仁山所称“将来对于教国文的材料,我们当然还要请胡先生来指导”云云,之后却未能有时间再加以“实验”了。1928年1月15日,高仁山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学校一度陷于停顿。事实上,高仁山被捕之后,奉系军阀就以艺文中学是“赤化窝巢”的罪名,将原设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大街72号的这所私立学校强行封闭,部分学生被迫转到天津南开中学。后经该校师生多方争取,于1928年9月租赁西城府前街的清代“升平署”重新开学。当时学校分为幼稚园部、小学部和中学部,统称为艺文学校。学校设在中南海东墙外,西长安街甲1号。

高仁山被害后,胡适积极奔走,为之筹备追悼会、抚慰其家属及赞助艺文中学等。据《胡适日记》1928年5月21日载,胡适曾经参与筹备高仁山追悼会。日记中写道:“又与端升、经农、赵述庭共商廿四日高仁山追悼会的程序。此事只有三日了,尚未有预备。仁山夫人陶曾谷又因小孩生病前天回无锡了。我不能等到此会,故催他们作点筹备。”追悼会之后,高仁山遗孀陶曾谷还曾

致信胡适，为高氏遗著出版及赞助艺文中学等事宜，多有磋商。

高仁山被害三年后，时至1931年，艺文中学创办六周年之际，刚刚卸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从上海移居北平的胡适，再次应邀讲演。此次讲演仍未见载于《胡适全集》，其内容未见披露，当可称“佚文”；《胡适日记》《胡适年谱》中亦未提及，其事迹未见载录，又可称“逸闻”。

幸运的是，这样的“佚文”与“逸闻”，藉一份1931年4月18日北平印行的《京报》的报道，得以留存。近日，笔者偶然寻获此报，胡适在艺文中学的第二次讲演的基本内容及事迹大概，就此明了。在此，转录原文如下：

艺文中学昨举行六周年纪念会  
上午纪念大会晚间游艺大会  
胡适之讲演谓读书须征服懒惰

艺文中学校，昨日（十七日）上午十时举行六周年纪念大会，晚七时开游艺大会。兹将各方情形，分志如左：

#### 纪念盛会

上午十时在大礼堂举行六周年纪念典礼，到董事、教职员、肄业生、毕业生，及来宾共六百余人。校长薛培元主席，行礼如仪。首由主席致开会词，略谓本校已成立六岁，初由高仁山校长创办，胡适之先生帮忙，渐谋扩充，始有今日。试验道尔顿制教育，一年级最感困难，三十日本可作完之功课，致需四十日始可完成，颇感时间之不经济。第二年学生作业，竟于二十四日内完成一月之学科，阅读参考书，较前为速。数年前我国各校试验道尔顿制，失败者甚多，其原因系仅试验一年级，而二三年级并未试验。我侪虽不敢任意试验，但在试验期间，非常谨慎，同样之书籍，全校只用六七本，余剩之钱，可购其他书籍。试验室仪器，多不重复，由此可知道尔顿教育适合我国，只因经费不足，致未能图谋发展。次董事胡适于掌声中登台，讲演大意如下：

#### 胡适讲演

今天庆祝艺文中学六周年纪念，我是非常愉快的。但对于道尔顿制和教育，我是外行。虽看过一点教育书，但是不敢谈教育。如《胡适文存》中，只有一篇替人家谈教育。方才听了薛先生的讲演，知道许多学校是太不经济。现在的中学课程标准，定得不好。一年可以学完的功课，因为班级制的关系，二三年还不能学完。如果实行道尔顿制，学生有了文字基本的练习，二年的功课，一年可以学完；一年的功课，数月可以学完；教员给了学生一个标题，学生可以在二三天内看了二三本参考书，养成阅书的习惯，便发生了无限的兴趣。讲到中学国文教员，有些人知道一点图文，便去教学生，简直看不起学生。我们小时候一年念的书，比你们四年念的还要多。平时念的《四书五经》，虽未经老师讲解，但有时偷看小说，便有点明了，不知不觉中有了章句的感觉。现在中学生读了四五年的历史，尚比不上从前十二岁的学童看了一部《通鉴》。我们基本知识不够，请教员看看知识缺乏的原因，指示出来，便可救济。读书必须刻苦。新教育家说读书须有兴趣，如看《情书一束》《少年日记》有兴趣，自然科学没有兴趣，鼓励兴趣，造成新的兴趣，才可以造成新的习惯。中国几千年，如在世代书香的家庭之下，不过也可多看小说而已，还不是真正的兴趣。如我小时算数学最喜欢，如将代数作完，就能跳两班。在暑假就做完了，没有时间的时候，便在夜内偷着做。在中国公学的时候，因病返里，乃喜念诗，病好回校后，日本人给我们讲数学，我们偷着去做诗，不做数学了。于是我被兴趣引着我，走了这条路了。我当时做数学的兴趣如此之浓，后来由做诗兴趣之更浓，便跑到文学路上。我们须想法，怎样跑到这兴趣之路。大家懒惰的代名词，就是假兴趣。我们要去征服假兴趣，去改变假兴趣，养成独立求学的习惯，智识才能增加。

次前教务主任杨四穆、师范大学教授王西曾、艺文幼稚主任张雪四、及毕业生孙汝楠，相继演说。

上述1100余字的报道，胡适讲演内容有700

余字的记述，是为这篇报道的核心内容。由此亦足见，作为艺文中学创办人、校董之一的胡适，无论在学校方面还是报社方面，均受到特别重视。

不难发现，胡适讲演仍未对“道尔顿制”展开评述，也没有对艺文中学教学模式有明确评价。讲演开篇即语，“对于道尔顿制和教育，我是外行。虽看过一点教育书，但是不敢谈教育”。只不过，通过批评中学课程标准普遍“不经济”，间接的对道尔顿制实施之后，可以节省教育时间，提高教育效率，表达了含蓄的赞赏。且通过道尔顿制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出发，导向了他所要阐发的讲演主题——学习的“真兴趣”与“假兴趣”。

胡适在讲演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兴趣，才是真正的阅读兴趣？由此而及，还会生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譬如，这样的兴趣，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教育培养的？这样的兴趣，可以求诸家庭熏陶还是学校培养吗？阅读兴趣与学习能力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凡此种种，皆值得研讨。

仅就此篇报道而言，因讲演记录的简略与粗略，胡适观点的细节，并不十分完整与确切，但约略可以窥知大概。讲演中，胡适拈出“新教育家”与“世代书香”两个事例，来说明自然发生的阅读兴趣，并不一定都能持之以恒，并不一定都能成就学业；且家庭熏陶之下的阅读兴趣，也并不一定都与学业有关。这样的阅读兴趣，在胡适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兴趣”，都可能是“假兴趣”，是随时都会转变的兴趣。

胡适以自身为例，坦陈自己小时喜数学，后来又喜做诗，最终又“跑到文学路上”。他认为，教育者就是要设法达成阅读兴趣与学习能力之间的转换，因此讲演中有云，“我们须想法，怎样跑到这兴趣之路”。而教育者与学生，都会有懈怠之时，都会在兴趣与能力的培养上，有懒惰之时，都会有不思进取、不求甚解，不辨真假、放任自流的时候。因此，胡适说，“大家懒惰的代名词，就是假兴趣”，并强调，“我们要去征服假兴趣，去改变假兴趣，养成独立求学的习惯，智识才能增加”。

### ◎1946：胡适胡适在艺文中学第三次讲演，首倡“实验外国语学校”

1946年10月13日，结束9年驻美外交生涯，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又应北平中等教育界同仁之邀，再赴北京艺文中学讲演，发表关于中学教育的意见。次日，此次讲演及内容见报，载于北平《世界日报》及《经世日报》等报刊。（《经世日报》所载此次讲演内容摘要，已辑入《胡适全集》）此次讲演，乃胡适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之后，首度对国内中学教育发表意见，且明确表达了应借鉴欧美“加紧语言训练”教育模式，尽快创建“实验外国语学校”的主张——如今这一办学模式，正普遍为国内公立私立各教育机构所采纳。可以说，胡适此次讲演，完全可以视作这一教育模式及潮流的始作俑者。因此，颇值得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尤其是中等教育史研究者充分重视与深入探讨。

这虽然是后话之后话了，但高仁山创办艺文中学之“实验”精神，与胡适贯彻一生的“实验”主义，在此也可谓再次因缘际会，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中等教育领域最后一次抒写了革故鼎新之风。

胡适生前各类文集、选集均未收入此次讲演内容，《胡适全集》虽收录有此次讲演内容摘要，但摘自1946年10月14日的《经世日报》，内容过于简略，且有不少疏漏之处，远不如《世界日报》所载详实确切。为此，笔者不揣陋简，转录《世界日报》原文如下：

平中等教育界欢迎席上  
胡适讲中等教育  
学生应加紧工具训练

【本报讯】平文化界昨日上午十时，在艺文中学开会欢迎胡适，到有文化界及各中等学校校长等约六十余人。首由主席介绍，胡适即登台讲演。对当前中华教育应改变方针，加紧工具之训练，阐述甚详，历时约一时始讲毕。其演词大意谓：

我不懂教育，更不懂中等教育，所以我以门外汉来讲教育。我觉得这几年教育太趋向整齐一

致方面，而缺乏一种新式教育的试验，以从试验获得新的途径。我认为中学课程太繁重，太注重课本、灌输和按步就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生，七个区域再加上沈阳招考，这几乎是全国中等学生的会考。考生三万多人，卷子二十多万份，我应找一个地方把它保存起来，请中国教育专家来分析和研究。

国、英、算、理化、史地、公民，这六科二十多万份卷子，可看出抗战期间，中国教育的成绩。三万多人我们取了三千人，感觉中等教育，很值得考虑和改善。英文程度低，还可说在沦陷区没机会念，尚有理由，但是国、算、理化、史地程度也很低，这真使我们惊异。三校若按战前标准取，三万人中只有一百二十个人合格。所以我们降低又降低，不过正式取了一千多人，先修班取了一千人。沈阳的考卷这两天可到平，比较起来工学院考生成绩还好。

中学教育的课程是功课太重，科目太多，上课时间也太多，所以不容易发展“工具的训练”。我们希望办中等教育的人，来北大看看那二十多万份卷子，基本工具科目在标准以下。我们大家可以把中学科目化繁为简，化多为少。不要谈教育潮流，更不要谈什么制度。假若，我们拿今年这八区二十多万份卷子来比较参考，明年夏天再这样的来比较参考，不出三四年，便可以试验出，将科目分量降低或不要。这不是提倡中学教育革命，也不是违抗部令。以这南至昆明北到沈阳的成绩来看，是值得我们考虑。

可是在教会学校的女校，她们还保持外国语的程度，比非教会学校略高些。我们不但大学应采直接教授法，在中学也应采用。美国在战争中，感到需要外国文，所以他们不能不求诸学术机关“美国学会总会”，叫他们研究。那时叫ASTP（陆军特别训练机关），后来便做“加紧语言训练”。在哈佛大学中，赵元任先生来担任教授，赵先生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在中国还是第一人。美国二百多大学都是做加紧特别训练，八个月中，把外国语言学好。他们能写、能说、能听、能译。教授必须懂得语言学原理、文法原理，把这原理编成大纲，先讲授给他们，然后把这种语言的本国找来做启导员（Informants）和学生混在一

起，改良他们说话的错误，指导并鼓励他们说话，造成一个说话的环境。过几个星期给他们用字母拼音的书，然后再发给正式课本。我们的国语也应该用口、耳、手的方法来教授，用他们那种加紧语言训练，来教我们的本国国语，是不是更能收效呢？

外国语的教授也是应该探索语言训练法的，如果我们没有训练的精神，怕教育局或教育部来麻烦，那么我所讲的话全是空话。如果感觉工具训练的需要，便该如此，不但美国如此，英国也如此，伦敦大学用这样方法训练，也是成功的。中学教育应采前进教授法，要应用活的语言，活的文字来表情达意，不能再去叫他们去作骈文古文或诗词。我们的全副精神要把国文目标改变，大学中应打倒守旧的份子，使他们全应用活的语言、活的文字，训练他们表情达意的方法。

上述1300余字的讲演报道及内容摘要，透露的历史信息与相关数据是极其丰富的。首先，据此可以确定胡适此次讲演的具体时间，为1946年10月13日上午十时，讲演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须知，胡适在当年10月10日的北大开学典礼上以北大校长身份首次讲演之后3天，即做此次在艺文中学之讲演。这两次讲演，《世界日报》均有报道，而胡适的北大讲演报道仅1000余字，比之此次在艺文中学的讲演报道还少了300余字的篇幅，足见此次讲演在当时所受关注度也是相当高的。

胡适于友人高仁山遇害近20年之后重返艺文中学讲演，且恰恰又在其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不久，其情其境，恐怕仍是别有一番况味在心头。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胡适在艺文中学的讲演内容，为什么似乎比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讲的还要多；亦不难揣摩，在胡适当时并不专事的中等教育领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令人深思、予人深省的主张。因为，作为艺文中学“发起人”之一的胡适与艺文中学创始人高仁山，确曾在国内中等教育领域方面的问题有过深入交流与切磋的；加之在抗战前后都曾一定程度的接触与参与过中等教育方面的工作，此次在艺文中学的讲演，胡适自然

是如遇故人，有感而发；自然是思如泉涌，慷慨陈辞。

### ◎胡适疾呼“实验”与外语教学并重

且看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教育界状况，的确不容乐观。胡适对此，颇感忧虑。大学与中学教育的相辅相承，大学招生与中学应试的联动互动——虽然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还并不算发达，但与之相应的大学生源质量却是更为不堪，中学教育领域俨然就是中国教育的“重灾区”。此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对此感受深切。

胡适谈到，抗战胜利后的全国首次大学招生，3万余人报考，仅录取3千人，这其中还有1千余人是收入所谓“先修班”，即预科班的。且如果按照战前标准，3万余人的考生中，竟只有120人合格。这说明，受长达14年的战争影响，抗战期间的中学教育质量并不理想，比之战前退步明显。与此同时，战后百废待兴，面对战时中学教育大面积滑坡与战后报考大学人数的大幅度增长，胡适提出了化繁就简，以“加紧语言训练”为核心的快速提升中学教育质量的总体目标。

虽然身为北大校长，也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举足轻重之人物，胡适对中等教育却寄予了相当程度的关切与企望。他希望借鉴欧美国家战时教育经验，在工具性知识教育的层面尽快寻求突破。为此，他提出了应当特别重视外语教育，并将外语教育的模式与汉语教育的方法互为参照、互相结合，在“加紧语言训练”的教育框架内，以最快速度重整与重塑整个中学国文教育体系。不难发现，胡适在讲演中强调的中等教育应当倡导的“实验性”与“加紧”外语教学两大主题，正是其一直主张并实践的中国“现代化”与“国际化”理念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正体现着他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力图从文化、教育两个基础重建来实现中国“文艺复兴”的一贯立场。

最后，胡适强调，中学与大学教育既然一脉相承，那么他自己作为北大校长，也应在大学国文教育方面做出实验性的表率。他说，“我们的全副精神要把国文目标改变，大学中应打倒守旧

的份子，使他们全应用活的语言、活的文字，训练他们表情达意的方法。”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胡适留下太多付诸于改造乃至改革大学及中学教育的时间，随着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全面崩溃，他也不得于1948年12月15日仓促飞离北平，之后暂寓美国，又迁居台湾，直至1962年病逝于此。

可以说，目前已知的胡适在艺文中学的三次讲演稿，一次为1925年5月31日在该校发起人大会上的讲演（《胡适全集》未收）；一次为1931年4月17日在该校六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胡适全集》未收）；一次为1946年10月13日应北平中等教育界同仁之邀在该校的讲演（《胡适全集》已收，但所据底本不佳，内容不够完整），均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重要史料之一，亦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及1949年之前中国中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值得深入探研与充分考察。

与此同时，艺文学校校史与创办人高仁山生平事迹，以及各类相关史料均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宝贵遗产，理应纳入相关研究者视野，予以高度重视。相信在此基础之上，发掘“实验学校”及“实验外国语学校”在中国的早期创办史与运营史，在更为开阔的历史维度上考察如今早已蔚然成风的这两类教育实体，应当大有可为之处罢。

事实上，胡适此次讲演之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至迟自上个世纪90年代始，这类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强调国际教育合作，以双语教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在国内中等教育界便逐渐发展起来，且已向小学甚至幼稚园教学模式中渗透。70年后返观胡适此次讲演主旨，其中关于教育实验、工具训练、化繁为简等诸多用于改造中学教育模式的倡言，不乏真知灼见。

如今，中国教育领域更多层面的实验与改革，还正在向纵深挺进，诸如中小学生学习课业及学科调整、学区划分、高考录取等诸多方面，亦正在进行持续已久的“教改”。可以预见，随着“教改”的纵深持续发展，中国教育的面貌将彻底改观，终会迎来“实验”成功，复兴崛起的一天。

## 他人致胡适英文信函一束

王波整理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这组英文书信，系由我的同事王波先生整理的。整理时，本人与王先生约定：均严格遵从原文，拼写、标点、语法等一仍其旧。个别有明显拼写错误的单词，则在后面的[]内加入正确单词。

### (1) 林达光(Paul Lim-Yuen)致胡适函

May 13, 1917.

Dear Suh Hu,

Merton and I were both much interested in the tale of the Old Man of Sing Fung, and we both feel that the English versification is excellent. We each went over it separately and made our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of which I have combined in the enclosed copy. Your 12th line lacks a syllable. This might have been supplied by substituting the words “young man” for the monosyllable “male.” The English construction: “which ended in...” is rather colloquial. Perhaps that is just the character you intended to give to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Old Man, but in that case it might be questioned if blank verse were the best medium. Robert Frost, one of the moderns, has evolved a colloquial blank verse form of his own which he uses, I think, with great effect. But it is a distinct modification of the dignified, pure blank verse, in which his colloquialisms and straightforward conversational [conversational] style and word order would seem grotesquely out of place. However, this, and anything else that I might say about poetry, is merely a personal impression. At any rate, you will be interested to note how Merton, not content with merely correcting the rhythm of line 12, threw it into what he considered more suitable blank verse form, - a change which affected the following line as well.

It is common enough for a blank verse line to have an extra, or eleventh, syllable. It was not so much to eliminate the extra syllable that I substituted a monosyllabic word in the 14th line. For musical reasons I wished to avoid the effect of the

juxtaposition of two similar syllables, “...en,” and “in.” Besides, the auricular unpleasantness is heightened by the nearby “i” sounds in “driven” and “burning.” But this is probably nothing but an awful quibble. Very likely my ears are hypercritical. Merton was not inclined to object especially to “driven.” Certainly it is the stronger and more expressive word.

Line 17 has the right number of syllables, but the “longs and shorts” are not evenly distributed - the stress does not fall correctly - in the phrase, “where plague rages...” Merton’s word “smites” is distinctly a formal or heroic blank verse type of word. I thought myself that “strikes” would have been perhaps more in character; - mere temperamental difference again.

I eliminated the repetition of “return” in lines 21 and 22.

For the sake of smoothness—or my sense of it—I inverted the word-order in the phrase “I was then.” I . 23.

“The pain of broken arm” sounds quaint to English ears and perhaps for that very reason is a valuable touch. In ordinary speech we would almost invariably modify the abstractness of the reference to so specific a thing as an arm by the use of an article, definite or indefinite: “the pain of a broken arm.” But the word “bone” seems to be sufficiently abstract in itself to dispense with an article. I fear this explanation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but I can only say that whereas “the pain of broken arm” sounds a trifle “queer” and outlandish, “the pain of broken bone” would pass unchallenged by any natives.

Line 28 has eleven syllables. As I said before, that alone would not matter, especially if the extra

syllable were ellided or if it occurred in a common word or had only a slight sound-value, like the “le” on the end of “little.” But the minor difficulty here implied is as nothing before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placing side by side the words “unknown” and “Yunnan,” both of which have a short “u” sound followed by two distinct “n” sounds—a very curious coincidence. All these things considered, it seems unbearable to have the line end with “Yunnan.” Merton made it as follows: “To fighting in far Yunnan-land unknown,” which is a good solution of each of the points mentioned above. My objection to this was the word-order which again sacrifices the conversational tone and becomes heroic. At the risk of putting the two difficult words together again I substituted an order which is slightly more direct, simple, and therefore to my mind convincing.

The last division or paragraph as you have written it is exceptionally happy, I like it immensely.

By this time you may be thoroly disgusted with the literal spirit which dissects poetry so microscopically on the basis of its verbal structure. But your Translator’s Note, in which I suspect irony, certainly gives rise to some very curious speculations as to the equally trivial and quibbling ground on which mankind bases its moral code—a tendency which increases alarmingly with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civilization.”

Merton wishes to be kindly remembered,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with him for showing us the timely poem of Peh Chu-Yi’s.

Sincerely,  
Paul

**(2) John Foord 致胡适函**

June 23, 1917.

Dear Sir:

The entr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war has brought the country into virtual alliance with China and Japan. Ties of interest, equally with ties of friendship, have been more closely drawn.

From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readjustment that

will take place after the war, there will emerge a China coming into her own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capable of safeguarding her own integrity, and a Japan with a new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her part in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Asia. For the United States a position of unique responsibility, a great trust, is thus opened not only in assisting to develop the untouched resources of the East, but as friend and media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mity and maintenance of peace on the continent which is the home of more than half the human family.

Toward this consummation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has been working throughout the twenty years of its history. To interpret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 of the Ear [Far] East, its Journal has been broadened into a great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ASIA.

When we invite you to become an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it is that you may have a direct part in building up, together with the present leaders in Far Easter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authoritative body in this country imbued with the resolve that it shall attain the fulfillment of the vision of the large place it should occupy in Asiatic progress.

We ask you to signify your pleasure on the enclosed form. A copy of ASIA will be sent on request.

Very truly yours,  
John Foord  
Secretary.

**(3) Grover Clark 致胡适函**

October 7, 1918.

Dear Mr. Hu:

Something over a week ago I wrote you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suggestion in your letter of June 30 that there might be a place for me at your University next year. There has been time for a reply, if there were no delay, but none has come. Hence I am writing again—not so much because I am very anxious for a reply as because I am afraid that in the

confusion of mails at present, especially in the Japanese post office, that first letter may not have reached you. If it has, there will be nothing new in this letter. If not, there will.

When you wrote me last spring offering a place for this year you mentioned certain points as to the conditions of a contract. Unfortunately I haven't that letter at hand, but I will take up the points as I remember them.

I. Subjects to teach. The subjects you mentioned—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hey were—are quite satisfactory. Or any other subjects that you might think it profitable for me to take. As I have suggested, my principal work has been done in Philosophy, with work also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sychology. But I should not hesitate to undertake work in English Literature. However, of that we can talk later.

II. Term of contract. You suggested a contract for one year, with option of renewal three months before expiration. This is quite satisfactory. I should hope—and, I confess, expect—that it would be renewed. But, as I have suggested, I want to get back to Chicago to finish up work for my Ph. D. sometime. And if it seemed best to go back after a year with you, I should be glad if the contract could be renewed, to take effect after a leave of absence of a year or two. Of that, too, more later.

III. Salary. You suggest that I name my own figure. On the basis of my experience here in Japan, and of what I have been able to learn from those who have lived in China, I should judge that I should wan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325 (Mexican) per month. What I should want is enough to live on comfortably, not extravagantly, and to put aside some for paying my expenses while studying in America. I mention \$325 not as a final figure, but simply as a tentative suggestion. If it seems too high—or too low—to you,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say so.

IV. Housing. You say the University makes no provision. Hence that would remain to be taken care of when—or if—I am to be in Peking. Of that, too, we can speak later.

This, I think covers the ground. Except, perhaps, that I have not suggested that I should like to have the contract begin with August, 1919, if possible. My contract with this school expires with the end of July.

As I have said, if you have received my earlier letter, this will be simply going of old ground. I am writing it to make sure that some word reaches you. There have been many reports of lost mail in the Japanese post offices recently that one feels much safer to se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duplicate, at different times.

I shall appreciate very much your letting me know as soon as you conveniently can about how things stand. If I am not to be in Peking, I shall see what can be done in the way of a position in Tokyo. And if that is where I am going, it will be well to start things moving soon.

I must say that I would much prefer to be in Peking, in your University, than in Tokyo, for the year. This for a great many reasons, not the least of which is that I hope that the connection if it is made will be a permanent one.

With best personal wishes,

Sincerely,  
Grover Clark

(4) Grover Clark 致胡适函

December 18, 1918.

Dear Mr. Hsu:

Your letter of October 5 reached me some time ago. I have not acknowledged it before because there has been nothing special to say. Moreover, I have been busy, getting out a little book to be used in my English teaching there, describing in simple English someth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also describing briefly the present forms of government in the chief democratic countries on the world. I find the students here most intensely interested in politics, but also most abysmally ignorant. Their ideas of their own history, even, are most vague. Everything for them seems to be classed into certain eras, but the order of

those eras, or the time that elapsed during any era is quite beyond them. That is, they seem to have absolutely no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ust recently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et somewhat acquainted with five Chinese students in this school. They are a very fine set of fellows. I asked them about your school; and they were most unanimous in their praise of it as very emphatically the best in China. Which simply confirmed what had been my own opinion.

And that leads to another remark. A couple of days ago I was informally asked by the school here if I would consider staying here another year. My contract is for one year; and when I came I said emphatically that I would not renew. But they want to know, now, if I have changed my mind, or would consider changing it. I do not think I shall. But I told them I could not let them know definitely until I knew a little more definitely as to what my own plans were for next year. The reason for their special desire to know now is that, if I am not to stay, they want to start negotiations for a man from America.

Hence I told them that I would write you again—tho I did not mention you specifically. I simply said I would write about a position in China which had been under consideration. I am a little afraid that this may seem to you like pestering. I hope not; because there is practically nothing else for me to do.

Mrs. Clark, while in Harbin with the American Red Cross, heard indirectly that two of the American teachers in your school were planning more or less definitely to go back to America next year. These I presume, are the two of whom you spoke earlier. I am wondering if something definite, more or less, may not have been said on the subject.

Now that the war is over, I am wandering, too, if you will not try to get Edgerton to come out. Just how he fared in the draft I do not know. My only information came from a letter from his wife to Mrs. Clark, saying that he had been ordered to report early in August but that, being a conscientious objector, he was going to refuse to do anything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military service. She hoped that he

would accept the offer that had been made to some C. O.'s, of doing reconstruction work in France instead of active military work, but she was rather afraid not. If he is free to come, he probably would be glad to, and you would be glad to have him. In which case, of course, his claim certainly would come prior to any suggestion of a claim which I might have.

I am sorry to trouble you again, but it really would be a very great favor if you w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you conveniently can about the situ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my taking a place in your school next year.

I would offer to send you one of the little books when it is published. But it is absolutely nothing but the most elementary sort of thing, and I doubt if you would be interested. I may be bitten by the bug that is supposed to go with authorship however, and do as others have done and inflict a copy on you.

Mrs. Clark joins me in best wishes for the Christmas and the New Year.

Sincerely,  
Grover Clark

(5) James G. McDonald 致胡适函

April 24, 1919

My dear Professor Hu:

Miss Margaret Alexander,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this city, has just written me that a Professor Tao suggested you would welcome literature from this country dealing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 idea. I am glad, therefore, to enclose copies of our various publications and shall see that you receive them regularly in the future.

I would very much welcome a letter from you telling us how you view the general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more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You will perhaps remember that you and I had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talk things over at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 summer conferences at Ithaca four or five years ago.

Very sincerely yours,  
James G. McDonald  
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6) Fitzroy Lloyd 致胡适函**

Shanghai, November 10th, 1919.

Sir,

On my return from England, I have the honour to inform you that I duly carried out the request of your Association conveyed to me by Mr. Fawn Yau viz; to ascertain if possible wheth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ould by [be] willing to allocate funds from the Boxer Indemnity to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of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placing Boy Scout Movement on a firm basis in China under their auspices.

I append hereto copy of the reply made by His Majesty's Minister to the question asked, from which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whole question has yet to be studied and that the enquiry made was very premature.

Sir Robert Baden-Powell informed me that he will not lose sight of the question and will keep me informed of the prospects of success in your particular request, as well as on the subject generally.

I regret that the situation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in the meantime, advise carrying on the Movement as before, not letting possibilities be considered.

I have the honour to be,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Signed) Fitzroy Lloyd, Hon. Advisor.

**(7) Louis P. Lochner 致胡适函**

Chicago, April 20, 1920.

My dear Friend:

It is certainly a long time since I have heard from you, and even now my information comes in a roundabout way through friend Mez, who was good

enough to show me your letter of January 16. It was kind of you in that letter to remember me.

I am exceedingly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mother passed away. I can appreciate your loss and your grief, in that I, too, have had a big blow dealt to me, in that my wife passed away on February 9, leaving my two kiddies and myself behind. My children are staying with their grandparents in Milwaukee, and every Friday evening I leave for Milwaukee to spend Saturday and Sunday with the kiddies at my father-in-law's home. It is something I look forward to all week.

Meanwhile, Mez and his wife are staying at our home in Elmhurst, N. Y. It is a long court procedure to dispose of the property, since my wife died intestate, and I prefer to have some one living there rather than to see it abandoned. The Mez's moved into there last December, when all of us started out for Milwaukee to celebrate Christmas with the rest of the family. I returned in January, and my wife intended to come on early in February with the children, but fell ill with pneumonia.

As you see from our letterhead, I have become identified with a new movement, The Federated Press. We have gotten so sick in this country of the perversions of truth in the press, especially as far as labor is concerned, that a number of forward looking editors have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ress association. The Federated Press is made up of editors of labor, non-partisan league (farmers), socialist and other working class editors. Already we are serving eleven daily and over thirty weekly papers, and every week brings us, on an average, three new applications.

I am deeply interested in what you tell me about the fight that you have put up in China. I see that you, too, are wielding the pen. Can't we get news from you about China? I am enclosing herewith a copy of our daily report, which shows you the kind of stuff that we are putting out. Under another cover I am sending you three additional sets of other dates, so that you may saturate yourself with Federated Press matter. I am hoping sincerely that we may get at least a weekly letter from you, containing news items both

regarding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regarding the working class, and I feel confident that, after the first few reports have been received, I can persuade our executive board to have you made a regular staff correspondent, and I wonder in this connection if we could get word from you as to how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s effecting the thought and the labor movement of China.

With kindest regards, I am,

Cordially your friend,  
Louis P. Lochner

(8) Lucius C. Porter 致胡适函

June 29, 1920

Dear Dr. Hu:

I send herewith the second section of your thesis and a copy of the same. I find that the first section with a copy was handed to you when you gave you [your] lecture on immortality to our students in March. I will have the final section finished soon and will send to you.

Let me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use of your thesis and the help it has given to me.

Heartily yours,  
L. C. Porter

(9) 邝富灼致胡适函

September 22, 1920.

Dear Dr. Hu:

I was sorry to learn from Dr. Chiang Monlin the other day that your health is not good. Perhaps you have been working too hard. I trust you will improve and that you will be yourself again before long.

I remember my visit with you in Peking during the Spring with pleasure. At that time you spoke of compiling a set of advance readers for the preparatory course in universit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ealing with science, sociology, philosophy, etc. I wonder if you have been able to undertake this piece of work. The idea seems good to me, and I

should like you to compile such a set of books for us. Will you kindly let me know w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do in compiling the series, In case you have been too busy to undertake the work, I shall be glad to try to get some one to carry out your idea. If you wish me to do so, kindly let me have some details of the idea you have in mind.

With best wishes,

Yours sincerely,  
Fong F. Sec

(10) M. N. Zankl 致胡适函

November 2nd, 1920

Mr. Hu Suh,  
Government University,  
Peking

Dear Sir:

We are in receipt of your letter of October 28th inquiring if we have in stock copies of the Modern Library. We are very sorry to say that up to the present time we haven't carried the Modern Library in our establishment for the reason that these publication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price and in additio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order certain titles.

If you wish we shall be glad to get a catalog for you from America and shall be glad to order any books that you want in quantities from the publishers.

Sorry that we do not have those books, we are,

Yours very truly,  
CHINESE AMERICAN PUB. CO.,  
M. N. Zankl

(11) Carl H. Milam 致胡适函

March 26, 1921

Dear Sir:

On account of your interest in libra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 am writing to invite you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I enclose an application blank herein which I hope you may care to fill in and return to us.

Yours very truly,

Carl H. Milam  
Secretary.

(12) Joseph H. Ehlers 致胡适函

May 25th, 1921

Dear Dr. Hu:

Dr. Chang Po-ling of Nankai has advised me that he talked with you about the proposed honorary scholarship society among the larger universities of China. You have probably read the statements that have been sent out through Dr. Chang about it. He suggested that you would probably be willing to accept a place on the 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society, for which place many of the leading educators who are serving on that council requested you be invited to serve. I trust that we may have the pleasure of having you on this. I take the liberty of sending you a late announcement of the society. About ten chapters have been formed and we are almost ready to announce the society by the end of May at the latest, it is believed. We would like to have a chapter at Peking University. Of course, owing to present circumstances it may not be possible to complete the organization at your institution. However it would be sufficient for the present to select a secretary to correspond with our national secretary. A few faculty members might be selected, especially we would like to have such well-known men as Chancellor Tsai and a few of the well-known foreign professors who have been at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Dr. J. Leighton Stuart,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is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is organizing the chapter at that institution. It is hoped that all the leading educators of China will be among the active workers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few who have been consulted at the present writing have heartily endorsed the plan, and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organizing. Among the sponsors may be mentioned Dr. P. W. Kuo, Dr. Chang Po-ling, Dr. A. J.

Bowen, Dr. John Leighton Stuart, Dr. C. T. Wang, Dr. F. L. Hawks Pott and many others. Tentative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formed at sev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work of organization has been so rapid and successful due to the enthusiastic response of all the colleges that it is hoped to formally announce the organization and elect members of this year's graduating classes. Committees are at work on various phases of the organizing. It is proposed to elect to membership some of the leading graduates,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hence it is likely that the society may attain considerable standing at the start and be able before long to hold meetings, publish papers, or undertake other measures for stimulating interest in research and for promoting scholarship among undergraduates as well as among graduates and faculty members. We hope to have a chapter organized at each of the institutions, a few faculty members and past graduates selected, with a secretary in touch with our general secretary and the general executive council by the fifteenth of May and shortly thereafter to publicly announce the organization. Several individuals and groups have already held conferences, discussing courses of study and other matters of general interest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This brief announcement will afford some idea of the aims and purposes of the organization.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forthcoming in the next few weeks, when we hope to announce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liminary organizing. In the meantime the leaders at the various institutions will be hard at work on the remaining details. The details of organization were stated on the previous statements sent out. I should be pleased to discuss any points that may arise, seeing that they ar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rusting that we may have your support in our effort to advance scholarship and encourage research among the university men of China through the society, I remain,

Very sincerely yours,  
Joseph H. Ehlers

**HONORARY SCHOLARSHIP SOCIETY**— **BULLETIN**

Satisfactory progress in the organising has been made. Several chapters, however, have not been heard from regarding final details. It is earnestly requested that those chapters which have not already done so send in as soon as possible, a list of the faculty members selected, the name of the local secretary, and if possible the names of the graduates of former classes who have been selected for membership.

It has been decided to have a Greek letter name for the society, with a Chinese name also, for local use. The Greek name selected is Phi Tau Phi (PTP) standing for Philosophia, Technologia, Physiologia, the best Greek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eld covered by the society, Philosophy,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The Chinese name for local use is still being considered.

The following names have been suggested by a majority of the original chapters, and we would like the approval of the list, for the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to serve for such time as may be decided upon at the next meeting of delegates it is possible to hold.

Minister of Education Fan Yuan-lien

Pres. P. W. Kuo, Nanking Teacher's College  
(Proposed Southeastern Univ.)

Pres. Hu Suh of Peking Gov't University

Dr. Chang Po-ling, Pres. of Nankai

Pres. J. Leighton Stuart of Peking University

Pres. F. L. Hawks Pott of St. John's Univ.

Dr. A. J. Bowen, Pres. on Nanking U.

Joseph H. Ehlers, Pei Yang University, National Secretary

It might be remarked that the selection for secretary was made because no one else was found who could be persuaded to take up that work. It is hoped that there will be volunteers for that position in the future. A representative of one of the Southern Universities will likely be added to the list. It is believed that meetings may be held at Ku Ling and at Pei Ta Ho this summer for discussing matters of importance, such as rules for admission of members and chapters, admission of women, etc. Already we

have received requests for admission from universities not at present included, although we have endeavored to keep the organisation secret until details were perfect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number of men elected from the 1921 graduating class be limited to five percent of the class, unless for exceptional reasons. More definite regulations will be made by the society, but the number allowed at any time will be rigidly limited, so men of the highest calibre only may gain admission.

It is further suggested that some member of each chapter prepare an announcement of the salient facts, aims, etc. of the society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ress, for use when we decide to announce the society.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date will be not later than June first. At this writing it is believed that ten chapters have completed their organization. These include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forthcoming shortly. It is hoped that each chapter will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ffecting its organization in order that we may be functioning as a national society before allowing our existence to be generally known.

(13) **Percy Horace Braund Kent** 致胡适函

2nd May 1922

Dear Mr. Hu Suh,

Some time ago a New York Firm handed to us a claim for \$211.21 on account of Messrs Lemoke & Buechner against the Peking Government Teachers College. No doubt it is a small matter which has been overlooked, and as personally I have the strongest objection to our Firm acting as a Debt Collecting Agency. I had intended to send the matter back at once whence it came. Unfortunately, however, it got buried amongst papers on my desk, and being a trifling matter was overlooked. I cannot very conveniently send it back now, and therefore I am wondering if you would be kind enough to tell me what and where is the Peking Government Teachers College. If you could do me the additional kindness of mentioning the matter to the responsible

person there with a view to having this small matter adjusted I should be very pleased. If, however, there should for any reason be a denial of liability it is my intention to take no further steps. There would be no point, however, in denying liability if it exists, for in due course the matter is bound to find its way into other hands and trouble ensue.

I hope you will not consider that I am presuming unduly on your kindness.

Yours sincerely,  
Percy H. B. Kent

P. S.

I have heard nothing further from Beach, and I presume you have heard nothing either from the Guaranty Trust. We may take it therefore that at least the money has been paid over. No doubt Mr. Beach is writing, and in my letter to him confirming the long telegram we sent I asked him to wire his decision if he had not already done so. We are therefore likely to hear something soon.

P. H. B. K.

(14) **Dwight W. Edwards** 致胡适函

PEKING. Jan. 14, 1922.

Dear Dr. Hu:

I am in receipt of an inquiry from the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asking for the whereabouts of Professor George Wan, Care of the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Peking University.

They have 1 box and 1 trunk of effects from H. P. Chu, Baltimore, merchandise sent to C. F. Li, Y.M.C.A., Shantung, August, 1919. C. F. Li is I believe, now in Shantung but does not wish to take delivery of the box. Can you give me any information as to the whereabouts of Professor George Wan,—which I should be glad to turn over to the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Cordially yours,  
Dwight W. Edwards

(15) **A. J. Armstrong** 致胡适函

February 23, 1922.

Dear Sir:

I understand that a number of Browning poem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the Chinese and that considerable work has been done in criticisms and various translations into anthologies and other works in Chinese.

I am making a specialty of collecting Browningiana and I want for our library everything in every language that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poet. I have already I suppose the finest collection of Japanese material on Browning in the world, surpassing anything that has yet been collected in Japan, and I should like also to have in my collection a copy of every book or criticism or publication dealing with Browning published in Chinese.

I shall be greatly indebted to you if you will assist me in this matter. It will, I am sure, be a matter of national pride to you to know that in this University we have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Browning material in the world and I am eager to enlarge our collection by securing everything that is at all concerned with the great poet.

Thanking you, I am,

Sincerely yours,  
A. J. Armstrong

(16) **Grover Clark** 致胡适函

January 9, 1923

Dear Hu:

I'm enclosing the copies of the two contracts—Mrs. Clark's and mine. I think these are substantially as we talked it over. Mine is dated July 1, 1921, because that is the time the original agreement expired.

If there are any points in these drafts which do not meet your approval, don't hesitate to say so.

With best wishes,

Cordially,  
Grover Clark

## (17) Lucius C. Porter 致胡适函

May 9, 1923

My dear Hu:

You will recall my hope that you might be free from pressing work in China to come to America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my stay at Columbia. I am very anxious to know whether or not you can come, and have the following plan to propose: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some fourteen years and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inviting a number of scholars to America to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in six or more American universities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This Committee is very eager to secure an Oriental scholar as its next lecturer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religions of his native country from the Oriental point of view. Some of your friends proposed your name as a suitable person to inaugurate such a series of lectures by Orientals. The nomination has been unanimously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foresaid Committee, and I have been appointed to write to you asking whether or not it will be possible for you to accept an invitation from this Committee to le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inter of 1924-1925.

Complete arrangements have not yet been made, but it is probable that your lectures would be given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lumbia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t seems to me that you should consider the opportunity of coming here to give these lectur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your patriotic service to China. In my endeavors to interpret Chinese life and culture to Americans, I find an encouraging welcome from almost all thoughtful Americans. The circle of those already interested in Chinese subjects is increasing rapidly. The success Professor William Hung has had in speaking on China to all sorts of audiences, both academic commercial and social, indicates the eagernes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China. There is beginning to be an appreciation by Americans of the significance to Americ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Your coming during the next academic year would give an impetus to this whole tendency which would have value for China and America. I hope very much that your work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so nearly finished that you can feel free to consider this invitation.

If you are able to come, I think you should prepare five or six lectures on various aspects of Chinese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 should want you to plan to give a little more time here at Columbia than in the other institutions, and for that purpose have made a larger provision in the budget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than will be asked for from other institutions. Perhaps you could plan to spend three or four weeks here, giving some special lec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series which would be prepared for the work in other places.

I do not know in what condition your health is at the present time. Of course that is a matter of primary importance and you should not venture to America if your physicians feel that the strain of an extensive lecture tour would have a serious effect upon your health. On some accounts you might find relief from strain in being away from China for a few months. You might be able to arrange the trip within the limits of one semester, so that your work in Peking would not need to be interrupted for a whole year.

One important item I have left to the last.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is not able to provide a suitable honorarium. It is my hope, however, to arrange with the universities interested so as to offer you an honorarium of at least \$ 3000 gold. I will let you know during the summer exactly about this matter. I am writing now 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consider the plan at least tentatively and that you may arrange your work in China in view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trip to America. I cannot tell you how much I look forward to the pleasure and privilege of

having your cooperation in my task here at Columbia and in the wider academic circles of America.

In addition to my own courses here at Columbia, I have done a great deal of speaking for China and hope to make that a part of my work for next year. Columbia is sending me on a trip to Europe to investigate the departments of Chinese in several universities there. I hope to profit much from the acquaintances that this trip will give me with European scholars of Chinese and with the plans which have been followed in other places. I am expecting now to return to Peking in the summer of 1924.

Will you not let me know as early as possible whether you can at all consider this opportunity to render real service to China and to America?

Heartily yours,  
Lucius C. Porter

(18) O. G. Villard 致胡适函

May 9th, 1923.

Dear Dr. Hu Suh:

The second week in October The Nation will publish its Fall Book Supplement. For this issue we would like to have a 2400 word article from you, if

the spirit moves you, on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use of vernacular Chinese on popular education.

As I understand it, this movement has produced voluminous magazine literature as well as drama. How far it has been accepted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literature, I do not know.

Indeed, important as those sensitive to world movements feel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China to be, there is extraordinarily little general knowledge of this even in quarters where one would expect an intelligent conception of what has really been happening in China in such matters. The desire to know more of what has been going on in China is so great that we are certain that an article from you would be met with the keenest interest.

Your article should be in our hands by the first of September. Will you kindly let me know as soon as convenient whether we may count upon you to do this?

Very truly yours,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EDITOR.

(王波, 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 居然跟“性博士”沾上了边 ——我与张竞生研究

陈漱渝

2018年9月,从遥远的广东汕头发来一封邀请信,内容是2018年12月14日至17日,韩山师范学院、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和广东省档案局将联合召开《张竞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联系人李彬老师来电话说,这次会议邀请了一些学界大腕;此外也邀请了我,原因是在新时期我研究张竞生起步较早。大约在27年之前,我在《人物》杂志和台湾《联合文学》先后发表了一篇长

文《“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我而言,“研究张竞生”是一种夸大之辞,准确地说我只是关注过而已。起因是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一次调侃。1926年9月3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讲到厦门大学选修他课程的学生多起来了,其中有五位女士。因为当时鲁迅跟许广平正在热恋之中,所以他对远在广州的恋

人承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许广平读到这封孩子气十足的情书，想起了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的观点。张竞生把女子比喻为花：“艺术之花”，“慈善之花”，“新社会之花”，“点缀之花”……认为人应该破除“私有之念”，可以像欣赏一切鲜花那样去欣赏一切女人。同年10月4日，许广平在回复鲁迅的信中俏皮地建议鲁迅对女生不必“邪视”，而是“冷不提防地一瞪”。鲁迅同年10月20日再复许广平：“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的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所以决计不瞪了。”可见鲁迅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张竞生的上述观点，而是认为他的想法和说法不切实际，带有乌托邦色彩，至少在五百年之后才可望实现。

后来在鲁迅的《三闲集》里读到《书籍和财色》一文，我对张竞生的印象就不免复杂起来了。这篇杂文是揭露有些书店用不正当的手段促销，除先定高价后再打折之外，还有买书赠丝袜、送画片、请吃冰淇淋等方式。最露骨的是情色促销，例子就是张竞生开了一家“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张竞生提倡“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所以也以“美的”作为书店店名。鲁迅未必去过“美的书店”，他的评论肯定是根据当时报刊的报道，而这种报道又肯定带有夸张和漫画化的成份。事实是：张竞生把他1927年在《新文化》月刊发表的五篇文章以《性育丛谈》为丛书名在美的书店出售，其中第一篇题为《第三种水与卵珠及生机的电和优生的关系》（又名《美的性欲》），曾刊登在《新文化月刊》第1卷第2期。张竞生的所谓“第三种水”即“巴多林液”。他认为女性在性生活中如果能分泌出这种水，其孕育的胎儿必定壮健优良。张竞生是从性学、优生学和胚胎学的角度研究这种生理现象的，但一般人却把“第三种水”简称为“淫水”，从而也就简单化地把张竞生的学术研究视为“诲淫诲盗”。其实，女性的这种生理现象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已有记载，中国古代的野史小

说中亦有描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方的性学专家更有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问世。至于雇佣女店员的做法，打破了上海商店只雇佣男店员的传统，在当时似乎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今天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还有人认为张竞生开辟了女性就业的新途径。对张竞生看法的见仁见智，引发了我对这位传奇人物的兴趣，因此收集了一些资料，写成了一篇《“性博士”传奇——平心论张竞生》，从他的学生时代，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活动，留学法国的经历，《性史》风波，婚姻恋爱，晚年境遇诸方面介绍了他的一生。文中有两个章节，专门介绍美的书店和关于《第三种水》的论争。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把此文交人民出版社的《人物》杂志发表。当时这份杂志颇具权威性，责编是我的朋友李京华女士。1991年我到台湾访学，又将此文交台湾《联合报》系统的《历史月刊》发表。该刊负责人林载爵是位学者，欣然同意，但临近付排时却被他的上峰撤稿，认为谈论张竞生颇为无聊。这件事传到《联合报》系统另一份刊物《联合文学》主编初安民的耳中，他大为不平，说：“这么好的文章，他们不登我们登！”这样一来，这篇文章又在《联合文学》7卷4期刊出了。《联合文学》是当时台湾文学刊物中的顶级刊物，稿酬一字一元台币，使我名利双收。张竞生在广东潮州和在台湾台北的亲属对此文均表示认可。张竞生的嫡子、广东潮州市饶平县政协副主席张超还多次到北京看我，这些都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应该是在撰写《“性博士”传奇》之前，我在《团结报》还发表过一篇跟张竞生有关的文章，题目是《谭陈联姻与爱情定则——六十年前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当时友人杨天石在《团结报》主持一个“民国史谈”专栏，责编全灵又是我的同乡和朋友，所以我写了一系列短文擂鼓助阵。后来“民国史谈”的文章筛选结集之后曾两次出版，我也将有关文章收进了我的自编文集。我不知道这组文章产生了什么影响，但从百度检索，此后类似这一标题的文章很多，2011年还有人将当时

的讨论文章结集为《爱情定则》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爱情定则”讨论的历史背景我在文章中已经介绍，故不赘述。在此仅仅重提张竞生给爱情下的四个定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深厚。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比较的东西。以组合爱情条件的多少和浓薄作为择偶标准，是人类心理中的必然定则。

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希望善益求善，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凝固不变的。由于订婚至解约，成夫妻至离异，用可变迁的原则衡量，实在是很正当的事情。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夫妻的关系与朋友的交好有相似的性质，不同之处是夫妻比密切的朋友更加密切，所以夫妻的爱情应比深厚的友情更加浓厚。夫妻若无深厚的爱情，就不免于离散。

何谓“爱情”？张竞生的“爱情定则”是否正确？这应该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的问题，见仁见智，一直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长期争论不休。在中国现代，较早提出爱情是何物的人应该是鲁迅。早在1919年，鲁迅就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借一位“不相识的少年”之口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的回答是：“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反对无爱情的婚姻，反对一男多女、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无可爱的悲哀”。

那么当代人对“爱情”又作何解释？查阅《辞海》，没有关于“爱情”的条目，估计是因为这个词的含义并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查百度百科，对爱情的解释是：“爱情简单的理解为，因对某些物的喜爱所产生的情愫。爱情有爱情情感、愿望、欲望等。爱情伦理关系，爱情承诺关系”（原文如此）；又说，“爱情”指两个人之间相爱的感情、

情谊。还有专家把爱情分为形而上层面和形而下层面，越说越玄虚，让我不想深究下去。比较起来，我还是认为张竞生的理解表述得比较直白，相对切合实际，虽然当年《晨报副刊》刊登的60多篇讨论文章当中，以反对张竞生的意见居多。

直言不讳地宣称“爱情是有条件的”，这很容易给人以功利主义的印象，认为玷污了爱情的纯洁性。比如许广平曾以“维心”为笔名参加讨论。她首先强调的就是爱情的高尚性和理智性，有别于动物的生理冲动。在其他文章中，许广平更强调自己是“真爱”的追求者。这种“真爱”可以使她毅然向旧传统、旧礼教宣战，“宁可丢弃名誉、地位、家庭、财富，忍受责骂，或委曲自己”，“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许广平的爱情是无条件的。她十二三岁桀傲不驯地公开反对包办婚姻，就是因为对方家长是个劣绅，民愤极大。她的初恋对象是表弟李小辉，爱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热情、任侠、豪爽、廉洁”，这些其实就是许广平的择偶条件。李小辉因猩红热病去世之后，许广平毅然选择了鲁迅，首先是因为鲁迅是她的人生导师，双方有着反叛包办婚姻的共同思想基础，又在女师大风潮中携手偕行，跟教育界的保守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这些条件，许广平决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爱上一个比自己年长十八岁的异性。所以，说“爱情是有条件的”并没有错，否则就成了鲁迅所反对的“盲目”的爱。只不过不同人择偶的条件不同：有的高尚、有的世俗、有的低下。前些年有些拜金女宣称“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低下的择偶观。

说“爱情是可以比较的”，这更是一个事实。既然择偶观有高下之分，不同人爱情的美满幸福度当然就可以区分。有人认为婚前可以比较，婚后就不应该比较，以免出现“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的情况，破坏家庭的稳定秩序。这其实是不同范畴的问题。所谓“比较”并非限定当事人进行比较，旁观者也会有意无意地比较。因为不

同的个体都是相对独立的存在，而有差别就有比较。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山外有山，天外无天”。人是既有情感又有理智的动物。正常生活中的男女在结婚之后都会用道德进行自律，自我主宰，不可能有“阅尽人间春色”的奢望。那种包含性冲动的激情自然不能持久，但爱情再添加上亲情之后就就像沙石遇到水泥，会凝结得更加牢固。除开道德、法律意识之外，子女财产和其它亲友关系也都能成为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

说爱情是可以变迁的，更不是提倡见异思迁，而只是在陈述一种现实。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一直是提倡“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但要共同凝视太阳初升，而且要共同凝视夕阳西下。然而对于一般人而言，初恋的成功率大约不高，因此有人甚至作出了“初恋大多是悲剧”的判断。其原因就是初恋的男女情窦初开，重视的是眼缘或其它瞬间感受，而对构建家庭的复杂性缺乏充分的认识。一旦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就产生了，初恋双方就会因为分歧不可调和而导致感情破裂。在当下社会，离婚率升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统计，2016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四百三十七万四千对夫妻，比2015年增长5.2%。我们虽然不能把离婚一律视为“爱情保鲜”，但离婚的社会原因确实存在，应该深入研究，妥善解决。真正做到“爱时珍惜，不爱时放手”，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一定要把家庭稳定视为社会稳定一个重要因素。许广平当年参加“爱情定则”的讨论时，曾反对爱情可以比较、可以变迁的观点，她反驳说：“我个人理想，以为爱情是最真挚，不屈于一切的。彼此如果有深厚爱情……忘我忘他，舍生忘死，心目中只有一人，那时尚容得着比较吗？尚有可以变迁吗？”许广平的肺腑之言，反映的是爱情的一种崇高境界，理想境界，但不能因此认为凡变迁之后的爱情就不是爱情，就一定贬值。许广平初恋李小辉时的爱情是崇高的；许广平在李小辉病故之后对鲁迅的爱情更是崇高的。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只有一次情感经历并从一而终的人毕竟是少数，这

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张竞生认为“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在当时也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认为夫妻在家庭子女、经济等方面关系密切，并且互受性生理驱动力的作用，跟一般朋友并不一样。问题是张竞生并没有将“夫妻”跟“朋友”之间划上一个等号，而只说是“朋友的一种”，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有人把朋友比喻为暗夜的灯，雨中的伞，没有年龄、性别、地域、种族之分，关键是够情谊深笃，心灵契合，困难时能够相濡以沫。因此，从广义而言，将夫妻视为朋友关系的一种是可以的。夫妻和男女朋友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仅仅取决于是否有性生活。

最后我还想谈谈张竞生关于“情人制”的构想。张竞生认为，“夫妇之道苦多而乐少”，所以他既反对多夫多妻的群婚制，也反对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和现在世界上最为通行的一夫一妻制。张竞生断言这些婚姻制背逆人性，最终将被“情人制”取代。需要说明的是，张竞生的“情人制”并非提倡滥交胡搞，而是“以情爱为男女结合的根本条件”，因为“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与，乃是欣赏的。惟有行情人制的男女才能彼此互相欣赏”，“利多而害少”（《美的社会组织法·情人制》）

“情人制”的“利”在何处？张竞生开列了四点：“第一，使男女了解情爱的意义。第二，他们知两性的结合全在情爱。第三，使人知情爱可以变迁与进化，岌岌努力创造新情爱者才能保全。第四，使人知爱有差等，即在一时，可以专爱一人而又能泛爱他人。”张竞生主张婚姻应以情爱为基础，而情爱只有不断创造才能保鲜，这种看法无疑是可取的。鲁迅小说《伤逝》中男女主人公婚姻的破裂，就是因为爱情未能更新、生长。但张竞生忘记了根本的一点，就是男女之间的性爱是有排他性的。如果允许“泛爱”，那又如何能谈及“专爱”？所以，他所说的“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恐怕会导致恋爱中的“杯水主义”，在现阶段更容易造成对妇女儿童权益的损害。

需要声明的是，我对伦理学、社会学毫无研究，更没有考察过婚姻制的问题。但我毕竟是社会的一员，多少有些阅历，所以还想对“情人制”发表一点浅见。在中国古代，“情人”可以指情感深厚的友人；但在当下，“情人”恐怕是多指有同居生活而无法律名份的男女。对于青春期正当恋爱的双方，一般都称之为“恋人”，或互称“男友”“女友”。我们无论对情人现象作出何种道德评价，这种现象的存在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甚至有发展的势头。我所说的情人现象，决不包括贪官或大款包养二奶，因为那是一种性贿赂或性交易，是对男女爱情的玷污和亵渎。据我观察，当下的情人现象不仅产生在中青年人群当中，老年队伍中同样存在。如果中青年男女同居，只要双方未婚，社会上已经采取了默认态度，没有单位和他人会去追究。不过双方或其中一方婚姻关系未能解除，那仍然会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当下社会之所以对同居现象采取了越来越宽容的态度，跟改革开放过程中人口的流动不无关联。大量农村青年到城市打工就业，他们有了结婚的需求而没有正式结婚的条件，同居现象于是应运而生，只是同居时间长短不同，分手的状况也有所不同。老年人队伍之所以也出现同居状况，多半是因为丧偶之后感到孤单，如果正式结婚又可能遭到儿女反对或遇到财产分割之类的麻烦。总之，情人现象业已成为当下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法律面前处于一种尴尬状况，也有人称之为“事实婚姻”。从原始社会的群婚制到当代社会的一夫一妻制，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适

应于当下的社会经济条件。张竞生提倡“情人制”，动机是反叛当时的包办婚姻制，但他的理论既不符合中国国情，本身又十分片面偏执，因而没有可行性。未来的婚姻制度究竟如何，那恐怕会像鲁迅预言的那样，只有五百年后才能见到分晓。

张竞生在他的传奇人生中，自然有多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但他的毁和誉都与性学研究相关。所谓性学，是指以研究性生理、性心理和社会中性现象为对象的一门学问，也是人类认识自身性行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虽然原始初民即有生殖器崇拜，广义的性学也有约2000年的历史，但现代的性科学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才初具规模。在中国，一方面有色情文化的存在；直至当下，在网络空间还可以轻易看到色情视频。卖淫或变相卖淫的情况还客观存在，性骚扰的事件也时有曝光。但另一方面，在全社会，特别在青少年人群中还缺失应有的性教育。不少人仍旧谈性色变，把性学视为神秘而又肮脏的领域。据统计，从2014年至2015年，到公立医院流产的有900多万例，而到2017年竟增加到了1300万例，其中65%都是未婚女性。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现代性学研究的前驱，张竞生的研究还是有开拓意义的。虽然他的理论有种种偏执和局限，但他决不是提倡“禽兽般地滥交”。上世纪五十年代，张竞生在新加坡出版了一本《十年情场》，对他的性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反思和自我批判，我认为态度诚恳，实事求是。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

## 《胡適時論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簡介

胡適紀念館供稿

### 胡適先生簡介

胡適（1891-1962），生於上海，逝於台北。在廿世紀的華人社群裡，胡適始終扮演領航者的角色。身兼學者、思想家、政論家、外交家等等

多重角色的他，更是懷持自由民主和人權理念奮力終身而不輟的知識人。胡適以自己的學術思想成果，為落實中國的「文藝復興」的理想，做出

了典範貢獻；胡適不能認同任何「主義」的意識形態，致力以理性說服世眾，引導輿論；擔任過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胡適，也為抗拒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鐵蹄，善盡己責。胡適更反對一切極權獨裁的權力支配，為成就一個充滿寬容、深富人

情味的文明社會，努力無限。在華人世界裡，環繞著胡適的話題，訴說不盡，彰顯了他的生命旅程和思想世界，必然是理解歷史趨向不可或缺的畫卷。

### 《胡適時論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簡介

2013 年開始，胡適紀念館正式啟動新版《胡適全集》的編輯出版事業，由胡適紀念館潘光哲主任承司主編，以「精益求精，後來居上」為目標，期可為學界提供最完整（毫無刪易）與最精確（匯總各種版本，進行編校）的胡適著作文本，以便利用。

新版《胡適全集》的出版事業，首先推出《胡適時論集》全套 8 冊、《胡適中文書信集》全套 5 冊，堪稱目前內容最豐富且完整的文本，必然廣受各界矚目。

胡適向來關注現實問題，提筆為文，啟發了世眾的多重思考。《胡適時論集》蒐羅整編胡適應時而發的議論，不僅彌補了過去舊版《胡適全集·政論》刪除大量胡適政論文字的遺憾，更透

過各種資料庫及網路資源進行地毯式搜索，期近於善。相較於舊版總字數約為 71 萬字；新版《胡適時論集》多達 199 萬字，在在彰顯胡適思想遺產的多樣風貌。

胡適交遊廣闊，他留下的大量書信，正是現代中國歷史變遷的一頁見證。較之舊版《胡適全集·書信》字數約為 110 餘萬字；新版《胡適中文書信集》多達 160 餘萬字，蒐羅整理更為完整，從而為瞭解胡適的思想與人際網絡，提供更廣泛全面的線索。

胡適紀念館期望，無論對學者或對一般讀者而言，《胡適時論集》與《胡適中文書信集》，都能成為研究和親近胡適最為方便與準確的依據。



#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修订)

《胡适研究通讯》于2008年2月创刊，由于得到海内外学界朋友的大力支持，这个刊物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起到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的作用。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5万字左右，于每季度的第三个月（即每年的3、6、9、12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胡适研究会的内部刊物，供学会会员及相关学会间交流、阅看，非卖品。其电子版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网站上查阅。

《胡适研究通讯》自2013年第3期（总第23期）起，向作者致送稿酬。作者来稿，于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凡决定采用的稿件，即通知作者，此稿即不宜再投给别处。凡一个月后仍未得到通知的作者，其稿作者自由处理。

凡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本《通讯》不再刊登。

《胡适研究通讯》发表的文章，文责由作者自负；本《通讯》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为从事胡适研究的朋友们以及对胡适有兴趣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mailto:hushi911217@126.com)